

第二章 中共戰略類型之分析

戰略有其目的性，「即為對於所能動用的資源作最好的利用，以達到政策所擬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又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性質，或是攻擊性的(例如征服或強迫對方接受某種不利的條件)，或是防禦性的(例如保護某種地區或利益)，也可能僅只是維持政治現狀而已。」¹由於每一國家資源有所限制，故資源運用要分主、從(成本小、效益大)，並須兼顧任務導向。因此，戰略並非簡單的公式或固定的準則，而是一種思想方法(method of thought)。「其目的就是要整理事件，將它們照著優先次序來加以排列，然後再選擇最有效的行動路線」²，以創造與運用有利態勢。

一般而言，評斷戰略優先性順序，通常以國家利益認定之，其中又以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問題為首要。由於戰略的本質是對抗國家利益威脅者，因此便會產生安全問題。換言之，戰略的另一層涵意亦在使國家獲得最大安全的行動自由。又由於國際社會中各個成員國皆以此為目標，故在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一門「國際關係」學科，意即在研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行動(action)、反應(reaction)及互動(interaction)過程所造成的結果及現象。因此，戰略研究亦成為一門獨立領域，且其發展的過程與國際關係的經驗頗為類似。

其中，在 1950 年代戰略研究開始走向理論化的途徑時，恰好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全盛時期，故戰略學者會以「移花接木」方式，吸收現實主義學派基本觀念。雖然到了 1960 年代中期，國際關係領域中陸續出現許多新學派，形成百家爭鳴的現象，但戰略研究領域中並未受此思想演變影響。換言之，至今有關戰略的理論分析和政策建議，仍是以一種現實主義者的範式為其架構。³這也是為何本論文欲引用現實主義理論分析中共對歐盟戰略之主因。

基本上，現實主義者乃以「人性本惡」為出發點，認為國際社會本質是一種無政府狀態(anarchy)，而在這無秩序的國際社會中，國家必須追求最大權力，以保障國家利益及安全，並強調現實的國際體系及架構乃是決定一國在國際社會中所有行動、反應及互動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先就現實主義觀點，分析中共對外之攻、守勢戰略類型，方能在研究本論文主題之前對中共戰略有一基本認識。

事實上，中共自 1949 年建政以來，對於國際環境的反應幾乎可用「十年一

¹ 薄富爾(André Beaufre)，《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鈕先鍾譯(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頁 27。

² 薄富爾(André Beaufre)，《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鈕先鍾譯(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 年)，頁 16。

³ 鈕先鍾，《戰略研究入門》(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頁 77。

小變，二十年一大變」形容之，其各階段戰略意涵亦隨之調整而有所差異。舉例而言，1950年韓戰、1969年中蘇珍寶島事件、1979年改革開放、1989年「六四事件」，乃至於2001年毅然決然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以下簡稱世貿組織)，皆對中共外交及安全政策有著深遠的影響。然而，這些政策又多根源於中共世界觀的反應。

因此，筆者欲先藉由本章第一節說明傳統中國及中共的世界觀；第二節則引用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論點，以及國際關係領域對於外交與安全政策取向的定義，進而說明一國戰略之類型；第三節再分析各階段中共外交與安全政策取向，並歸納出各時期的戰略類型。最後並綜合整理有關中共戰略類型，進而鋪陳本文欲藉由探討中共對歐盟戰略，以印證中共戰略之應然與實然一致性。

第一節 傳統中國與中共的世界觀

「世界觀」(Weltanschauung)是指對外部世界的整體觀念，亦是人類對生命、社會、國家及世界展望所投射出來的一種價值體系。而所謂「外部世界」，即通常所指的是國際環境的結構和狀況。因此，一個國家必須瞭解其所處的國際環境，才能夠求其生存之道，進而求發展。這正是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律，任何國家都無法違逆。換言之，倘若一個國家在綜合國力不變的情況下，國際環境的變化是可以影響其國際地位的高低。因此，筆者認為一國唯有先認清所處的時代，理解其在國際體系中所占的地位，才能更精確地制訂合乎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目標。質言之，「世界觀」是影響一國生存發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其必然影響一國外交及安全政策目標的制訂，而外交及安全政策目標亦決定國家對外環境(國際體系)所採取的反應行動，此即為一國之戰略。

然而，一國對國際體系之認知並非憑空想像而來。誠如學者羅斯納(James N. Rosenau)教授曾指出：「人類任何行爲，一部分受到過去經驗累積的影響，一部分受到當時環境的刺激。」⁴其中，「過去經驗累積」意謂為一國傳統歷史文化，故一國之外交及安全政策亦會受到該國歷史文化因素影響。因此，學者Lucian W. Pye及Robert C. North等主張，當前中共對世界的認知是傳統中國世界觀的延伸，其對外行爲受到中國歷史文化的影響。⁵不過，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及金淳基(Samuel S. Kim)、尹慶耀等學者則認為，中共對外認知與傳

⁴ James N. Rosenau, *Linkage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vergence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145.

⁵ Robert C. North,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China*, 3rd ed. (North Scituate, Mass.: Duxbury Press, 1978), 15.

統中國世界觀仍存在著一些根本上的差異，⁶並綜合歸納中共的世界觀與傳統中國文化最大不同在於：一是以鬥爭代替和諧；二是以群眾主義代替精英主義；三是以平等主義代替階層主義；四是以國家主權獨立代替朝貢關係。⁷因此，筆者欲就傳統中國世界觀及中共世界觀比較分析，並進一步瞭解相互之間關聯性，以利後續中共戰略之討論。

一、傳統中國的世界觀

一般而言，數千年來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內容的，大概可濃縮在儒家、道家、佛家等思想裡面。其中，儒家思想又成爲中國自漢朝以來，官方所獨尊的意識形態。因此，其在中國政治、社會、文化上存有支配性力量。儒家思想的始祖首推孔子，至孟子乃集大成。宋代以後更發展成爲朱子、陽明之學，以「仁」與「義」爲基本精神。其主要內容乃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的關係加以區別，並建構彼此相互關係的倫理體系，來強調「禮」的秩序。⁸

由於儒家思想重視人倫與家庭的觀念，因此在中國社會及人民的思想中，普遍種下深厚的根基。而在《大學》裡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項則更說明了中國人從自我完成到家庭、國家、世界的過程。因此，儒家所謂「修、齊、治、平」之道，可稱爲「擴大家庭」，即爲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⁹換言之，儒家對於秩序的觀念是「由內而外」、「由近而遠」及「由親而疏」的。

美國研究中國問題學者費正清，曾於1968年編輯一書《中國的世界秩序：傳統中國的對外關係》(*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嘗試勾劃出一個以中國中心主義(Sino-centralism)的世界觀架構，並將組成分子國加以分類。其中，第一圈層爲「中國文化圈」，所指涉的是傳統中國邊界上的國家。第二圈層爲「亞洲內圈」，在傳統中國邊界外，但中國的權力卻能及於之處。第三圈層爲「外圈」，主要是傳統中國權力所不能及於之處。¹⁰

因此，筆者引用費氏提出的架構，並以同心圓的分層結構，結合中國近三千年來對外關係發展，作爲分析中國對外關係的戰略架構，並進一步形塑出以

⁶ 學者尹慶耀強調「中共的黨，不是中國社會自發的產物。它所信奉的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背道而馳。這是研究中共外交之前，應先具備的認識。」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101。

⁷ Samuel S. Kim, *China,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9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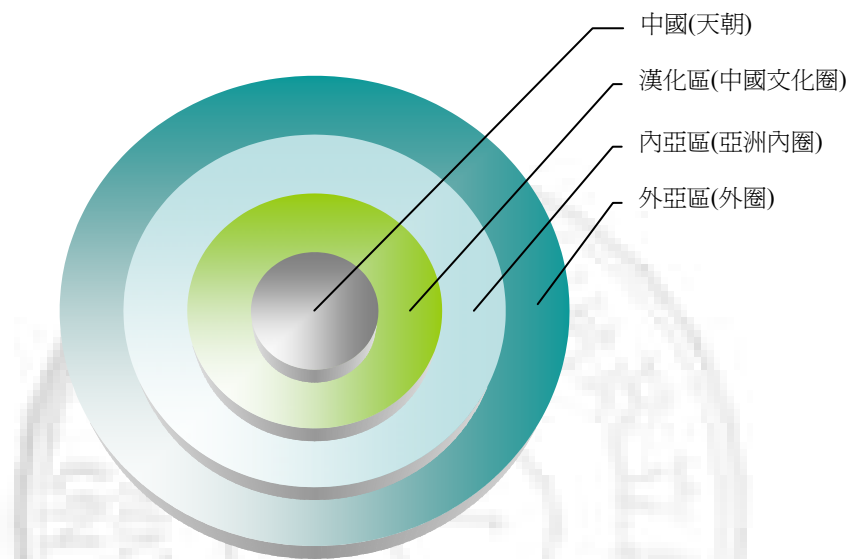
⁸ 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4年)，頁59-61。

⁹ 李亦園、楊國樞編，《中國人的性格》(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4年)，頁61。

¹⁰ John K. Fairbank,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ed. John K. Fairban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3.

中國為世界中心之「天朝型世界觀」架構及組成分子國。¹¹有關分類如下：(1)中心：中國(天朝)(Middle Kingdom)；(2)漢化區(Sinic Zone)：包括朝鮮、安南、琉球、日本等受中國文化影響地區；(3)內亞區(Inner Asia Zone)：絕大部分亞洲國家，包括泰國、菲律賓等中國權力尚能所及之處；(4)外亞區(Outer Asia Zone)：不臣服或不朝貢的亞洲國家，中國權力不能及之處。(見圖2-1)

圖 1-1：中國傳統的世界觀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由上述可知，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是充滿著儒家思想對於秩序的觀念。事實上，在西方勢力入侵之前，中國一直是亞洲最有影響力的國家，並且經常以追求和諧、秩序的世界主義姿態展現，促使邊境各族及鄰邦無不臣服，甚至透過朝貢方式，表達對中國國際地位的認同及肯定之意。因此，傳統中國的世界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認為中國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而且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可與中國對立的國家存在，此即為所謂「中華思想」。

進一步而言，這種「中華思想」乃基於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優越感，意謂著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優越於異族的，文化也高人一等。因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尤其是漢族)，唯其可以德化感召異族。對異族而言，他們只能成為中國世界秩序的一員而已。因此，這種「中華思想」不但對於近代中國民

¹¹ 清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為「天朝型世界觀」，中國雖不敢自號為天國，但天子坐明堂，率水之濱，莫非王土，其它的方國乃是夷狄戎蠻或「四裔」、「九服」、「殊方」、「異域」、「四荒」，從稱謂上就顯示他們的臣服、隸屬、邊緣、異常等性格。陳淑美，〈誰說中國人安土重遷？－中國古代的遊記文學〉，《台灣光華網》，

http://www.sinorama.com.tw/ch/show_issue.php3?id=199858705118C.TXT&page=1

族意識的抬頭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且影響到現今中共戰略的基本觀點。

二、中共的世界觀

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來，雖信奉馬列主義及實施文化大革命，但始終無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切斷關係。尤其，其高舉著民族主義的大旗統治中國大陸，顯示其思維仍脫離不出傳統中國世界觀思想。

事實上，中共的「世界觀」乃以其源自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及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實踐經驗，而這套「世界觀」即為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未來就理應具體表現為社會主義陣營鞏固提升，與資本主義走向崩潰的歷程。¹²因此，社會主義便成為中共世界觀中，追求世界公平、正義的指導原則。它使中共在世界中的角色具有正名的作用，亦形成對其他國家的期許作用，進而透過外交手段，以宣揚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同時聯合社會主義國家對抗資本主義國家。例如中共取得政權初期，即認為社會國家應團結一致並主張「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故外交上採取「一面倒」向蘇聯，接受蘇聯共產國際的領導。¹³但另一方面，吾人亦可由1954年6月中共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來看，中共將此企圖擴大至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區，而從其倡議「亞洲人民團結大會」的成立，便可瞭解其為「中華思想」的心態反映。綜合而言，中共的世界觀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並隱含著大漢沙文主義(Han Chauvinism)，¹⁴即中共試圖並有意恢復歷史中國優勢的傳統地位，以增加其國際影響力及建立「中國式」的國際新秩序。

一般而言，中共的「世界觀」概可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戰爭與革命」世界觀，時間由中共建政至毛澤東死亡，此乃代表中共對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主要看法；第二階段「和平與發展」世界觀，時間為鄧小平接掌政權後至今，此則代表中共對後冷戰時期國際關係主要看法。其中，筆者認為在第一階段，發展最完整的理論為中共「三個世界論」；在第二階段，發展至今較為成熟的理論為中共「大國外交」。因此，筆者欲藉由傳統中國世界觀架構，討論在此兩階段中共對外格局的看法。

(一) 「革命與戰爭」世界觀—「三個世界論」

基本上，「三個世界論」是沿襲1964年中共提出新「中間地帶論」脫胎演變而來的。這可從當時中共總理周恩來在1971年12月、1973年3月兩篇秘密講話得到驗證。他在該兩篇講話中說明外交政策的改變，是為了解脫與美蘇兩

¹²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1994年)，頁55。

¹³ 吳福寶，〈夥伴關係重塑中共大國地位之成效分析〉，《中共研究》，35卷2期(2001年2月)，頁111。

¹⁴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頁80。

面作戰，並欲借助美國力量重返國際社會，以因應國際多元化的變化。同時，運用統戰策略多方爭取與國，促進世界力量對中共做有利的轉化。周恩來並以毛澤東的「重慶談判」為例，說明與美蘇列強的談判，是沿襲早年處於劣勢時代對付強敵國民政府的故技，用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策略。¹⁵另外，中共外交部長喬冠華在 1972 年 10 月出席聯合國大會時，亦曾抨擊美蘇兩個超級國「騎在別人的頭上稱王稱霸，反對超級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¹⁶由此可知，中共急欲在美蘇兩強爭霸之外，建立自己的國際地位及形象。

1974 年 4 月 10 日，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在美國紐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大會上發表了著名的「三分世界論」時指出：「從國際關係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繫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剝削和壓迫者，是新的世界戰爭的策源地。」¹⁷並進一步聲明：「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¹⁸換言之，中共將美國、蘇聯兩超級大國劃為「第一世界」；歐洲、日本等先進國家劃為「第二世界」；而包括中共在內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及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屬於「第三世界」。根據此一理論，中共確定其對外鬥爭路線和外交政策為下列三點：¹⁹

第一，以「第三世界」為反對霸權主義鬥爭的主力軍，堅定地站在「第三世界」的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積極支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鬥爭。

第二，以「第二世界」作為暫時聯合的同盟者，但明白承認為聯合「第二世界」只是鬥爭策略運用，即利用「第二世界」與美蘇兩霸權之間矛盾，但不意味著可以抹煞「第二世界」國家同「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矛盾，亦不意味著可取消被壓迫國家和壓迫人民反對壓迫者和剝削者的鬥爭。

第三，以「第一世界」作為鬥爭的打擊目標。但對美蘇兩霸權要區別對待，側重於「反蘇」的鬥爭。因為蘇聯比美國更具欺騙性、侵略性、冒險性。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中共「三個世界論」的世界觀是摻雜著中國傳統世界觀轉化而來，形成一個以中共為中心之同心圓。(見圖 2-2)其中，中共自許為「第

¹⁵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周恩來關於國際形勢的兩篇報告摘要》(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83 年)，頁 320-321。

¹⁶ 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11 月)，頁 52。

¹⁷ 轉引鄧中堅，〈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收錄《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周煦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1994 年)，頁 5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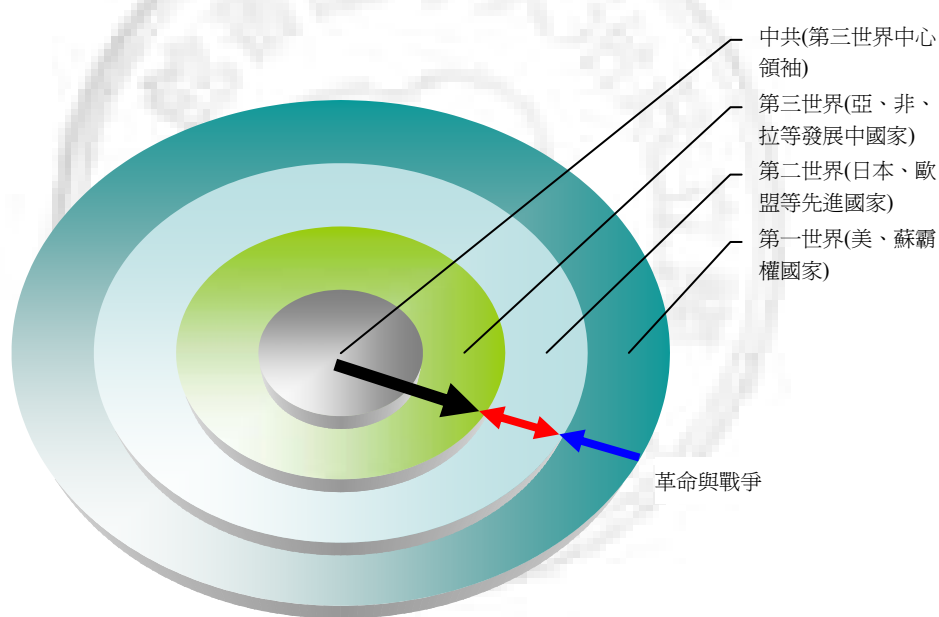
¹⁸ 轉引鄧中堅，〈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收錄《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周煦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1994 年)，頁 56 頁。

¹⁹ 《匪情年報》(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83 年)，頁 124。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11 月)，頁 52。

三世界代理人」，並欲領導第三世界。而第一、二、三世界各圈層之間皆存在以「革命與戰爭」貫穿的相互矛盾及對抗的世界觀。由此可知，「三個世界論」是中共反霸鬥爭外交戰略的指導方針，也是中共對實施國際統戰的理論根據。

不過，由於在「三個世界論」下，中共似乎陷入同時反美、反蘇兩面作戰的困境，造成對中共國家安全不利因素，故其乃將馬列主義階級鬥爭與毛澤東「正」、「反」、「合」的矛盾理論基礎納入「三個世界論」中，也就是區分「誰是主要敵人，誰是次要敵人，誰是暫時的同盟者或間接的同盟者」，以決定「依靠誰、團結誰、打倒誰」。由此可知，這理論顯示 1970 年代中共外交政策的基石，極富謀略性和鬥爭性。而這「三個世界論」亦象徵著自中共建政以來，其對冷戰時代的國際體系認知。

圖 1-2：中共「三個世界論」之世界觀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二) 「和平與發展」世界觀—「大國外交」

中共為要使自己成為亞洲地區的政治領導國家，勢必要透過積極的外交行動，發展經貿合作關係，號召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以及支持擴大多邊組織的角色等作法，來擴張自身影響力。²⁰故當鄧小平掌權後，認為「現代化」關起門來做將不可能成功，並再三強調要利用先進國家的資源來建設社會主義，而選擇「參與」策略，積極納入國際體系，大大改變中共過去的世界觀。

²⁰ 劉慶元，《解析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臺北：揚智文化事業公司，2003年），頁80。

因此，1979 年中共實施「改革放開」經濟政策，到了 1982 年中共更實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其目的乃在於走出「鎖國」狀態，積極發展經濟，進而融入世界，發展「全方位外交」，而不願僅在美、蘇兩強之間做選擇。因此，「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便成爲至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之後，中共一貫不變的外交政策核心。

雖然 1989 年「六四事件」爆發後，中共在後冷戰時期外交上有所調整，但基本上依然堅持「改革開放」及「獨立自主」政策，並隨著全球化時代潮流，加速經濟成長，進而提升中共國際政治地位。1990 年代中期，中共開始熱衷於所謂「大國外交」，並取得相當的成果，如 1996 中共與俄羅斯宣布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7 年 5 月中共和法國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7 年 10 月中共和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1997 年 12 月中共和東南亞國協立建立「睦鄰互信夥伴關係」、1998 年 4 月中共和歐盟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1998 年 11 月中(共)日建立「致力於建設性夥伴關係」等，故與大國交往架構大致已成爲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的新策略。

2002 年 11 月中共召開十六大之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與溫家寶接班成局，在外交方面更明確提出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的對外方針。尤其，面對後冷戰「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軍事政治反恐、和平發展優先及經濟全球化相互依賴，中共都一再強調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希望通過區域組織建設和經濟合作等方式，全面提升與周邊國家及世界大國合作關係。²¹

因此，不少學者針對「大國外交」之內涵結合中國傳統歷史世界觀加以研討，如中共學者葉自成教授就認爲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設計應以東亞中心，把中、俄、印度、印尼、日本等五國，作爲建立東亞地區秩序的主導國家。同時，認爲在實現「多極化新戰略」的目標下，它的關鍵應在於：爭取歐盟與轉化美國霸權取向。²²另外，中共學者楚樹龍教授在分析中共外交戰略，則引用類似學者費正清的同心圓圈層戰略指出，中共未來的外交戰略設計應採取：(1) 亞洲地區戰略：從雙邊到區域合作及一體化戰略；(2) 美歐俄戰略：夥伴和對手的選擇；(3) 中東、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戰略：應採取發展外交。他認爲在這樣的戰略設計上，中共還需配合多邊外交的戰略，這樣可以讓中共通過國際體系內的努力，逐漸推動並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促進實現人類社會進步的原則、主張和理想。²³

國內學者王崑義、蔡裕明則認爲中共的外交設計，大致是運用中共地緣戰

²¹ 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 年），頁 199。

²² 葉自成，〈中國實行大國外交戰略勢在必行—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幾點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1 期（2000 年 1 月），頁 7-8。

²³ 楚樹龍，〈全面建設小康時期的中國外交戰略〉，《世界經濟與政治》，8 期（2003 年 8 月），頁 11-13。

略為規劃方向，並修正費正清的三個同心圓圈層的架構，成為現今中共「大國外交」戰略設計三圈層：²⁴

第一圈層是以中共周邊國家為主，中共稱作「睦鄰外交」政策。這種外交進行的方式主要是以經濟優先，政治在後。所以任何周邊國家與中共在經濟上的合作，都廣泛的被中共接受，特別東協國家，許多貨物的進口都已經達到零關稅的情形，顯示中共對於東南亞國家的重視。為了以經濟作為交往的模式，中共可以與周邊國家的主權爭議擱置，甚至同意共同開發，以營造中共是一種「和平崛起」的面貌。

第二圈層是以歐亞大陸為主體，特別是在對歐盟部份，中共已提出「三個願意」的「善意外交」。²⁵這種外交的進行方式主要在於政治、經濟並重，而中共除了在經濟上給予優惠之外，許多重大投資案也都以歐洲國家為主。在經濟交往的背後，中共一方面希望歐洲國家能牽制美國所給予他的壓力，一方又希望歐盟能解除自 1989 年「六四事件」以來的武器禁運政策。畢竟，美國與歐洲國家以間存在著既合作又競爭，中共適度的把外交觸角利用「紅蘿蔔」與「棍棒」的原理，在歐美的矛盾中牟取利益。例如，在 2003 年美伊戰爭之前，當美國與法、德在和與戰之間爭執不休時，中共則時而選擇站在歐洲國家的一邊，時而保持中立，這就是中共在「大國外交」的投機性之處。

第三圈層是以美國為主，中共稱為採取著避免衝突的「和平外交」。這種外交的進行方式主要是以政治為主，經濟為輔。政治因素除中美雙方制度不同、臺灣主權與戰略地位問題爭議之外，最重要的是在冷戰以後，雙方都把對方當成一個假想敵。美國所假想的中共可能崛起成為一個可以與其爭霸的大國，而中共所假想的卻是過去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經驗，所以美國變成是被中共假想為被侵略歷史的總合。雖然中共有這種假想，但畢竟目前的國力還無法與美國進行對抗，所以只好以政治手段與美國周旋，變成是中共對美外交戰略的主軸，進而營造一個「和平外交」的假象。

其中，各個圈層之間則以「和平與發展」貫穿，以凸顯中共大國外交的世界觀(見圖 2-3)。透過同心圓三圈層的戰略架構，在中共遠程的戰略設計上，期望恢復歷史上的「中央王國」的地位，在亞洲建構「中國治理下的和平」，在形式上有意重建「朝貢冊封體制」，以有別於美國以軍事向全球拓展的全球化。²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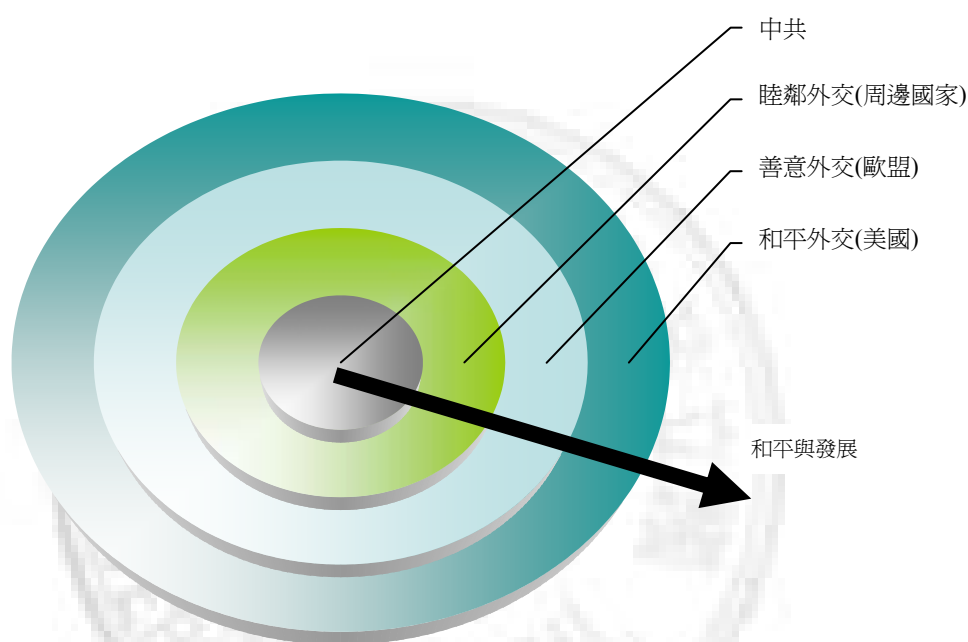
²⁴ 王崑義、蔡裕明，〈「戰爭論述」與「非戰論述」的平衡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 259-260。

²⁵ 2003 年 10 月 13 日，中國發表了首份對歐盟的說帖，其內明白指出：「中國願意本著互尊互信、求同存異的原則，促進雙方政治關係健康穩定向前發展；願意按照平等協商、互利雙贏的精神，推動雙方各領域的全方位合作；願意在相互借鑒、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擴大交流，增進中(共)歐人民之間的相互瞭解和友誼。」這就是所謂的「三個願意」，參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²⁶ 王崑義、蔡裕明，〈和平崛起：轉型中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對台戰略思考〉，《全球政治評論》，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無論在冷戰或後冷戰時期，中共的世界觀基本上受到傳統中國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所影響而成的世界觀。而這也正是中共在現今國家發展中，不斷強調「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權」及「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吾人可由以上分析可知，歐盟在冷戰或後冷戰時期皆被中共視可以聯合的次要敵人或合作的競爭對手，其主因無不在於歐盟在地緣上對中共較無威脅性且可牽制其主要敵人所致。

圖 1-3：中共「大國外交」之世界觀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參考王崑義、蔡裕明，〈和平崛起：轉型中的中國國際戰略與對台戰略思考〉，《全球政治評論》，第9期(2005年1月)，頁60。

第二節 外交和安全政策取向及戰略類型分析

戰略之具體目的(purpose)在於實現政策抽象目的(goal)，故戰略的「實然」與政策的「應然」實為一體兩面，相互呼應的。猶如戰略大師薄富爾(André Beaufre)於本章前言所述，吾人可依一國政策目標的特性將其戰略可概分為三類型：攻勢戰略、守勢戰略及維持政治現狀。²⁷但嚴格說來，筆者認為「維持政

第9期(2005年1月)，頁59。

²⁷ 薄富爾認為攻勢方面有八種態勢：攻擊、威脅、奇襲、佯攻、欺詐、突擊、消耗、追擊。在守勢方面有六種態勢：戒備、擋開、反擊、擺脫、退卻、脫離。詳見薄富爾(André Beaufre)，《戰略緒論》(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y)，鈕先鍾譯(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頁47。

治現狀」的本質亦為守勢戰略的一種。而無論是攻勢或守勢戰略，皆可透過外交與安全政策窺知其精義。因此，筆者欲藉由討論攻、守勢現實主義之概念，進而說明外交和安全政策取向及分析一國戰略類型。

首先筆者欲先說明的是，為何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能對本論文主題提供完整與合理的說明？其主要理由如下：(1)雖然一般同意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戰略似現實主義觀點出發，但由於現實主義理論過於廣泛與模糊，如果能以較明確的守勢和攻勢現實主義來取代，將更具有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能力。(2)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包含豐富的理論內涵，除了能適當顯示中共對歐盟戰略類型外，更能反映不同時期的特色。(3)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雖是相互對應的理論主張，但是兩者並非對立而只有程度差異，可包容在現實主義理論體系內，建構一個較完整的分析架構。(4)建構後的分析架構，可以提供觀察、比較與探討戰略變化與發展的能力，並從中顯現發展特色與變化原因。

一、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基本論點

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的爭論源起於 1980 年代末期，其主因乃當時面對冷戰東歐及蘇聯相繼崩解等戲劇化的變化，現實主義不僅無法在事前提出適當的解釋及預測，亦無法在事後有效呼應國際理論的發展，致使現實主義面臨強大的挑戰，除了在外圍遭致眾多國際理論的批判，在內部亦逐漸形成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兩派觀點。²⁸換言之，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為因應國際環境巨變，在後冷戰時期所發展出來的現實主義兩學派理論。

事實上，現實主義理論發展至今，早已非原先單一理論架構，而是形成一個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理論族群。如學者 Stephen Van Evera 所說，現實主義並不是一個單一理論，而是一個研究典範。學者 Robert Gilpin 也指出，現實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哲學立場，而不是一項科學理論，可以被證明或推翻。²⁹而目前

²⁸ 關於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名稱的出現，一般是追溯到 Snyder，但他對攻勢現實主義原使用「侵略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一詞。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12. 其他學者也有自創的稱呼，如 Kaufmann 稱攻勢現實主義為「悲觀的結構現實主義」(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為「樂觀的結構現實主義」(optimistic structural realism)；Brooks 稱攻勢現實主義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守勢現實主義為「後古典現實主義」(postclassical realism)；Glaser 稱守勢現實主義為「條件式的現實主義」(contingent realism)。但學界最常用的仍是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這兩個名稱。Stephen G. Brooks, "Dueling Real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Summer 1997): 445-477.

²⁹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in *Realism: Restatement and Renewal*, ed. Franke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Van Evera 的話出自 "Elements of the Realist Paradigm: What Are They?" *Typescript*, 27 January 1992, 4. Gilpin 的話出自 Robert G.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t," *Security Studies* 5 (Spring 1996): 6. 轉引自王元綱，〈樂觀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守勢現實主義之評析〉，《國際關係學報》，18期(2003年12月)，頁2。

在現實主義族群下至少包括五個相關學派：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1990 年代以來的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和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及強調外交政策行為角色的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³⁰這些學派雖對現實主義有著共同的基本主張，但在層次分析、權力運作、政策影響力和決策者角色等問題則互有觀點差異及強調重點。

基本上，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皆由結構現實主義所衍生而來，並且認為安全為國家追求的目的，權力不過為欲達到目的的手段。但是國家首要之任務是維持現狀，還是追求最大的相對權力？國家到底要有多少權力才算足夠？這些基本主張皆存有一定程度的模糊空間，再加上兩學派有不同強調重點及詮釋角度，進而發展出相當不同面貌的國際觀。因此，攻勢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兩派間相互爭論持續近十年之久。一般而言，守勢現實主義在 1990 年代期間略居上風，而攻勢現實主義則從 2000 年後逐漸抬頭。³¹

其中，攻勢現實主義最具代表性學者 Mearsheimer 在其所著《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專書中，³²特別將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稱為人性現實主義，³³Waltz 的結構現實主義稱為守勢現實主義，並與其所提出的攻勢現實主義等三者做一相互比較(見表 2-1)，簡扼說明了三種現實主義對權力追求的主張。其中，攻勢現實主義特別強調無政府的國際社會，認為「國際關係就是權力鬥爭，國家會不斷的擴張權力以追求國家安全。」³⁴因此，國家一定要採取攻擊，安全才會有保障。守勢現實主義則主張「國際關係不必然是權力鬥爭，國家可藉由外交政策的手段尋求合作，而且防禦是獲取國

³⁰ 現實主義學派相關論述詳見：莫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國際政治學》(*Politics Among Nations*)，張自學譯(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6 年)、瓦茨(Kenneth N. Waltz)，《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胡祖慶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1 年)、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評析〉，《問題與研究》，42 卷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1-18。

³¹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評析〉，《問題與研究》，42 卷 2 期(2003 年 3 月)，頁 3。

³² Mearsheimer 從 1990 年起連續發表若干頗具爭議性的論文，除了駁斥當時國際理論的錯誤，並結合新現實主義權結構的與古典現實主義的權力鬥爭主張，形成極具侵略性和衝突性的攻勢現實主義面貌。有關論點在其著作《大國政治的悲劇》中有詳盡的論述，而該書可稱為當前最具攻勢現實主義觀點的代表作。

³³ Morgenthau 的古典現實主義是以「人性本惡」為出發所詮釋，至 1970 年代因受行為學派(Behaviorism)方法論的影響，以及意圖建立理論的驅使下，在 1979 年 Kenneth Waltz 由國際體系權力結構的觀點，並結合古典現實主義有關權力政治的基本主張，建立了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理論，一般稱為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並成為近二十年影響國際關係理論思維最重要的理論。

³⁴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評析〉，《問題與研究》，42 卷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2。

家安全較有效的方法。」³⁵因此，國家社會並非那麼不安全，國家獲得安全的最佳途徑是結盟，例如北約組織。

表 1-1：主要現實主義理論區分

區分	人性現實主義	守勢現實主義	攻勢現實主義
引起國家爭奪權力的原因？	國家內在的權力欲望	體系結構	體系結構
國家想要多少權力？	1. 所有能得到的 2. 國家使相對權力最大化 3. 把霸權作為終極目標	1. 不多於所擁有的 2. 國家注重維持均勢	1. 所有能得到的 2. 國家使相對權力最大化 3. 把霸權作為終極目標

資料來源：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1。

由於現實主義者認為國家為國際社會之主要行為者，因此國家在國際體系現狀的滿意程度，可藉由其對外戰略類型彰顯出來。理論上，對現狀不滿意者會試圖改變或推翻現狀，在戰略上傾向採取攻勢行動和策略來進行擴權。³⁶滿意者則傾向維持現狀，在戰略上傾向採守勢行動和策略來進行權力平衡。不過，筆者認為由於一國國家資源有限，故不滿意者仍會理性地採取守勢戰略，以增補其國力不足之處，進而審時度勢再採取攻勢戰略。

換言之，大部分的國家都採取守勢戰略。除非某國成為全球霸權，³⁷才有能力隨心所欲地發動攻勢戰略，以滿足其最大安全的行動自由目的。無論如何，在國際社會本質為一種無政府狀態的大前提下，國家基於生存及發展需要，所採取以追求權力最大化的攻勢戰略或以維持權力平衡的守勢戰略，皆是以追求一個滿意安全環境為目的。

綜合而言，筆者認為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者最大差異在於國家對國際安全環境的認知。前者認為國際環境不安全，故國家須以擴大權力以獲得

³⁵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評析〉，《問題與研究》，42卷2期(2003年3/4月)，頁2。

³⁶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評析〉，《問題與研究》，42卷2期(2003年3/4月)，頁14。

³⁷ 按照米爾斯海默的分類，霸權分兩種。一種為全球霸權(global hegemony)，另一種為區域霸權。全球霸權即是世上「唯一」的大國，米爾斯海默認為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是，沒有任何國家能得到「明顯」(clear-cut)的核武優勢。同時，跨海投射兵力到敵對大國的所在區域，是極為困難的。所以在實質上，各個大國都只會尋求成為區域霸權，並盡量阻止其他區域出現霸權。也就是說，尋求成為世上唯一的區域霸權。

安全；後者認為國際環境不如想像中的不安全，故國家僅需維持權力平衡即可得到安全。但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國家在擴大或維持權力的過程中，皆是以國家利益作為最高指導原則。

二、外交政策取向

學者 K. J. Holsti 在其名著《國際政治架構分析》(*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書中，將一國之外交政策分成四要素來探討，分別為外交政策取向(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s)、國家角色(National Roles)、目標(Objectives)及行為(Actions)。³⁸四者之間彼此相互關聯，且大體上具有一致性。其中，Holsti 將外交政策取向界定為「一國為了達成國內外目標及克服持久威脅而採取的一般態度」。因此，外交政策取向對於一國戰略類型的訊息傳送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般而言，一國外交政策取向是由價值(Values)和觀感(Perceptions)所構成。³⁹決策者根據其主觀的價值與觀感來評估外來訊息，再就評估的結果制定政策。換言之，外交政策取向是為了適應國內外環境，而不斷調整其目標、價值及利益，經由決定者主觀判定後所產生出來的結果。其中，外交政策取向具有兩種特性，一是連續性(Continuity)，二是改變性(Alternation)，包括適應性(Adaptability)、調整性(Regulation)、轉變性(Reorientation)等三種。⁴⁰這是因為在國際體系中，大部分國家的外交政策皆有永久性的(permanent)目標行為，所以國內體系或許改變，領導者或許異動，均不能改變外交的連續性。除非，內外環境發生重大改變，外交政策才需要改弦易轍。

另外，Holsti 亦將角色概念應用在國家對外政策領域研究，並定義國家角色為「外交決策者對於適合本國的一般性的決策、義務、規則及行為的自我確定，同時還包括了處於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在持久基礎上應盡職責的自我確定」。⁴¹換言之，外交政策不僅是為了國家利益，而且是關係到一個國家的性質，即

³⁸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i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117.

³⁹ John T. Rourke, *Making Foreign Polic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 China* (Pacific Grove, Californi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49. 轉引劉德海，〈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朝鮮半島政策與日本政策〉，收錄《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政策》，周煦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4年），頁 117。

⁴⁰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i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126-127.

⁴¹ 阿爾德蒙，〈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轉引羅琨、黃旭，〈從國家角色理論淺析冷戰後中國安全觀的變化〉，《河池學院學報》，24卷3期(2004年8月)，頁 119。

一個國家「想要成爲什麼樣的國家」。⁴²不過，外交政策本身需具有彈性，才能不斷調節，以適應外在環境時空的更迭。換言之，所謂調整僅在於小部分的修正，外交政策最高目標仍然存在。

因此，Holsti 認爲外交政策取向可藉由以下四項因素加以分析：⁴³(1)國際體系的結構，也就是一項國際體系爲限制其構成單位的行動自由，所建立的支配、從屬與領導的模式。(2)國家的一般外交政策策略，可能與其國內態度以及社會與經濟需求的性質相關連。(3)決策者對於國家的自身價值、利益與威脅的感受程度。(4)一國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徵，以及擁有的天然資源。

不過，筆者認爲一國歷史文化傳統、民族主義及意識型態因素而結成的世界觀亦是影響外交政策取向的因素之一。因爲世界觀的變數對一國外交政策取向的影響是長期而全面的，更何況其亦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決策者對外世界的認知及外交政策取向的選擇。

故藉由上述因素，吾人可導引出四種外交政策取向：一是孤立(isolation)，二是不結盟(nonalignment)，三是外交結盟(diplomatic alignment)，四是外交聯盟(diplomatic coalition)或軍事同盟(military alliance)。有關內容分述如下：⁴⁴

- (一) 孤立。一項政治與軍事的孤立戰略，可由下列各種情況表現出來：對於國際體系內多數問題的領域極少介入；與其他政治單位及社會的外交和商業往來爲數極少；企圖關閉國家，以防止外來的各種滲透。此類型在歷史上並不常見，但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即處於封閉狀態，並幾乎完全斷絕國際關係。
- (二) 不結盟。是指一國家不願意將它的軍事力量(有時也包括外交與經濟上的支持)，投注在另一國家的目的上。其與中立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中立化國家是由其他國家的行動而獲得它的地位，而不結盟國家則是它自己所選擇的政策類型，並不能保證其地位將可爲其他國家所尊重。換言之，「不結盟」是建立自動自發，而非強權保證的基礎上，並可拒絕與強權簽定軍事同盟爲目標。
- (三) 外交結盟。就緊密度或聯盟的基礎方面來看，此類型雖比「不結盟」的關係更緊密，但又非完全爲「外交聯盟」。其通常是指一國非正式但持續性的與另一國的合作，⁴⁵通常爲外交與經濟上的支持，但由於缺乏穩定性且

⁴² 羅伯特·庫珀(Robert Cooper)，《外交的五個座右銘》(Five Maxims for Diplomacy)，轉引周弘主編，《共性與差異—中歐夥伴關係評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2。

⁴³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118-120.

⁴⁴ 第一、二、四項爲 Holsti 的分類，第三項爲筆者加以補充之。參考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118.

⁴⁵ 高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歐宏信、胡祖耀譯(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2003年)，頁84。

不致於締結軍事同盟條約等地位。

(四) 外交聯盟或軍事同盟。一般來說，聯盟與同盟在名詞意義區分上並不明確，皆是指若干國家聯合起來，以協調一致的作為達成特定目標，且多數時候有白紙黑字的條約做為見證。而一國政府之所以尋求建立永久的外交聯盟或軍事同盟，通常乃是認為國家動員的能力不足以達成其目標，以維護其國家利益或嚇阻明顯的威脅(perceived threats)。於是，其便會與面臨同樣外來問題的或擁有共同目標的其他國家結成聯盟，甚至在軍事上採取一致的行動。如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北約組織等。

綜合而言，筆者認為上述四分類取向可依在外交層次的緊密程度加以區分為：外交聯盟或軍事同盟 > 外交結盟 > 不結盟 > 孤立。

三、安全政策取向及戰略類型

由於筆者欲以攻勢戰略或守勢戰略來推導中共戰略類型，故引用攻勢現實主義及守勢現實主義理論。其中，此兩理論的核心議題乃在於究竟要多少「權力」才能得到「安全」。然而，Holsti 並未針對安全政策加以討論或分類。故筆者試圖將 Holsti 外交政策目標之短、中程外交政策目標有關「確保本土主權及獨立生存權」及「增加本國威望」轉化為「提高國家安全」及「增加對外影響力」二個取向。⁴⁶其原因有二：一是由於重建整個國際社會的長程外交目標是很難藉由一國之力而達成的；二是攻勢及守勢現實主義探討議題重點在於「安全」與「權力」之間的平衡性。同時，筆者亦引用日本學者豬口孝所提出之安全保障政策類型，以強化本論文論述有關安全政策取向之基礎架構。

首先，豬口孝認為在討論安全政策目標時，應注意其為外向性(extroversion)或內向性(introversion)取向。所謂外向性政策係指政策目標擺在對外方面。換言之，為了增加對外影響力，沒有必要乃至不可能大幅改變本國的核心價值或制度，意圖在此前提下將別國列為政策對象，亦或因應國際環境。內向性政策是指政策對象針對國內，即為了確保國家安全，與其改變國際環境或促其改變以

⁴⁶ K. J. Holsti 對外交政策目標分類為短、中、長程三類目標。(1)短程目標：即核心價值及利益(Core Value and Interest)，其大致可分成三項：第一、確保本土主權及獨立生存權；第二、取得優越的戰略邊境；第三、維護國內種族、宗教或語言上的統一。(2)中程目標(Middle-range Goals)：其大致上可分為三類：首先是「改善本國經濟」，其次則在行有餘力後設法「增加本國威望」，甚至進行對外擴張。(3)長程目標(Universal Long-range Goals)：是指在國際社會中一個政治實體根據傳統、民族主義及意識型態所制定的最終目標，意即對國際體系的一種計畫、理想與憧憬。值得一提的是，中程目標與長程目標的差異，不只是時間不同，而且在範圍上有顯著的差別。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7), 122-123.

因應變局，不如重估國內價值或制度，做出某些改變或改善來因應。⁴⁷

因此，上述劃分是基於安全政策對象的不同，亦即注意變更何者才可以提高國家安全。譬如，當國家感受到外來威脅大於自己所能對抗時，有不少的情形是改變國內制度或目標以增加實力來因應，而不是針對國外的主體、國際環境。反之，當國家感受到的內部威脅大於自己所能對抗時，則諸多情形是和外國合作或是朝國際環境下工夫，而不是謀求國內的改變。

另一組取向是活動程度，其主旨在掌握政策的積極性(positivity)或消極性(passivity)。所謂的積極和消極乃是專門指活動程度而言，與政策對象的區別無關。

進而言之，吾人將這兩組取向結合成一個座標圖，則可得出四種安全政策取向。假如進一步再賦予各種微妙的變數，加上「國家資源」變數，則這四種安全政策取向，又可以各自再細分為「強」與「弱」兩種，⁴⁸而得出內、外向性各四種安全政策取向。(見圖 2-4)其中，此處所謂的「國家資源」係指國家研擬實行政策時，一切可動用的綜合國力，亦即一國之硬國力(含經濟力、科技力、國防力、資源力)及軟國力(含文教力、政治力、外交力)各項權力的綜合指標。⁴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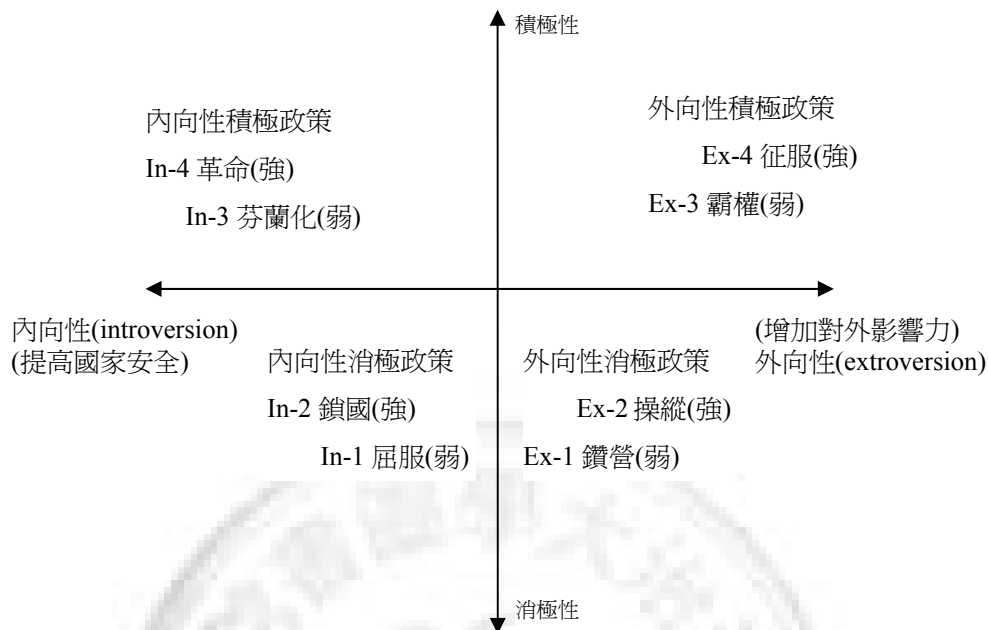


⁴⁷ 豬口孝，《國際政治經濟の構圖》(東京：有斐閣新書出版社，1982年)，頁48-50；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56。

⁴⁸ 豬口孝，《國際政治經濟の構圖》(東京：有斐閣新書出版社，1982年)，頁51；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56。

⁴⁹ 黃碩風，《綜合國力新論：兼論新中國綜合國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119。轉引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59。

圖 1-4：安全政策取向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參考豬口孝，《國際政治經濟の構圖》(東京：有斐閣新書出版社，1982年)，頁 64；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11 月)，頁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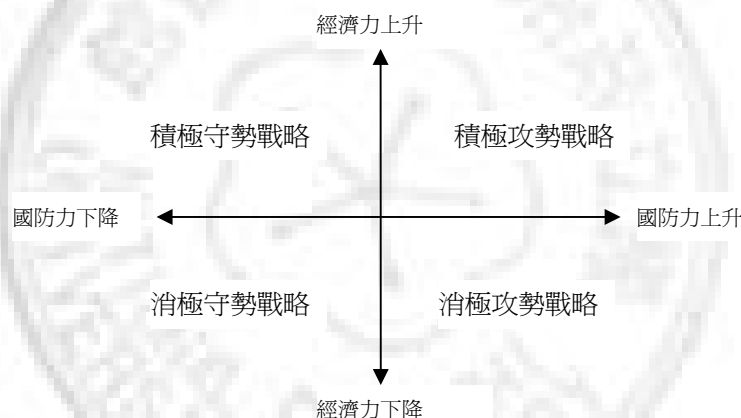
綜合上述，筆者認為有關內向性政策重點在於國家安全內部威脅來源，其政策又依其動員國家資源程度大小分為：革命、芬蘭化、鎖國、屈服等四分類取向。其中，前兩者的本質為積極性，後兩者則為消極性。外向性政策重點在於國家安全外部威脅來源，其政策依據其動員國家資源程度大小分為：征服、霸權、操縱、鑽營等四分類取向。其中，前兩者的目的在於「追求權力極大化」，意味著自以為具有某種優勢(通常為軍事優勢)，而且想立即把這種優勢發揮到最高的限度，以獲得國家最大利益，故筆者將其視為「攻勢戰略」類型；後兩者的目的在於「維持權力平衡」，意味著透過外交手段，要在盡可能長的時間內，保護國家既得利益不至於受到敵人的威脅，而其設計的著眼點皆為了阻止敵人的前進，使敵人在行動上感受到各種困難，但又不損失該國大部分實力，故筆者將其視為「守勢戰略」類型。

進而言之，筆者可將內、外向安全政策取向結合攻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並轉化為「消極守勢戰略」、「積極守勢戰略」及「消極攻勢戰略」、「積極攻勢戰略」等四類型戰略。其中，各類型戰略又因動員國家資源強、弱程度不同可再細分為弱(內)弱(外)、弱(內)強(外)、強(內)弱(外)、強(內)強(外)等型態。

如同前述，戰略目的在於創造及運用有利態勢，以求國家生存與發展。而

一般來說，經濟是國家求生存之命脈，國防為國家求發展之後盾。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一國經濟力及國防力做為分析一國之戰略類型的主要指標。其中，前者通常以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衡量，⁵⁰可反映出國家政策之積極性或消極性；後者通常以國防預算經費衡量，因其為一個國家整軍備戰之主要指標之一。⁵¹換言之，一國戰略類型可由其經濟力及國防力上升或下降的相對應指標來做觀察研究。其中，對經濟力而言，「上升」意謂一國之經濟條件良好時，生存較不受威脅，將傾向採取積極性的政策；⁵²「下降」意謂一國之經濟條件不佳時，生存較易受威脅，將傾向採取消極性的政策。對國防力而言，「上升」意謂一國軍事動員能力增加，國家發展面對威脅時將傾向採取攻勢戰略；「下降」意謂一國軍事動員能力減少，國家發展面對威脅時將傾向採取守勢戰略。因此，筆者進一步將安全政策取向(圖 2-4)轉化為戰略類型圖(見圖 2-5)。

圖 1-5：戰略類型圖



資料來源：筆者自繪。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認為一國若採取「消極守勢戰略」，通常為一國經濟條件不佳時，人民因經濟蕭條而對政府不滿增加，社會及政治的不安浮現，國家決策者對自己的權位鞏固及國家安全的信心度皆很低，必須著重處理國內事務，再加上經濟實力不足而無法發揮對外影響力，對於國際事務的介入將既無心也無力。為了爭取經濟發展及維護國家安全，決策者亦將避免與他國對抗及衝突，並儘量維持合作關係，以營造一個友善安全的外交環境。

⁵⁰ 高登斯坦(Joshua S. Goldstein)，《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歐宏信、胡祖耀譯(臺北：雙葉書廊有限公司，2003年)，頁11。

⁵¹ 吳建德，《中國威脅論：後冷戰時期中共軍備的擴張》(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頁134。

⁵² 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50。

一國若採取「積極守勢戰略」，通常為一國經濟條件轉趨良好時，其國家發展著重於經濟活動擴張，但較不願意主動介入國際事務，即使介入也將採取較為低調的態度及手段，避免與對手發生軍事衝突。

一國若採取「積極攻勢戰略」，則並不一定意味著對外發動戰爭及侵略，而是指國家對國際事務有高度的參與意願及試圖發揮影響力，並在必要時採取強硬的軍事手段。原因通常在於當國家經濟及軍事實力強大時，將較有能力執行戰略目標，而國家決策者對於個人權位鞏固及國家安全的信心也較高，因此對國際事務的關心程度提高，態度也較為強勢。

一國若採取「消極攻勢戰略」，通常為一國處於不利的經濟條件下，國家決策者為了轉移國內不滿而對外採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正因為國內經濟實力不足，此一政策將很難持久，甚至遭到嚴重挫敗。例如蘇聯自阿富汗撤軍即是一明顯例子。⁵³

第三節 中共外交和安全政策及戰略類型分析

由於一國的外交及安全政策可彰顯出該國戰略類型，故筆者認為在探討中共對歐盟戰略之前，實有必要討論中共自建政以來各階段時期的外交及安全政策，一方面可藉此說明中共對國際環境之看法，另一方面可印證中共戰略目標的「實然」與「應然」一致性，以利本論文後續之討論。因此，筆者將依本章第二節所述之外交和安全政策取向來分析中共各時期外交和安全政策，進而歸納中共戰略類型。

一、一邊倒(1949-1953)

1949年6月30日，當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將近完成之際，毛澤東在其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提出「一邊倒」路線，他說：「為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向蘇聯一邊倒。中國人不是偏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偏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⁵⁴這就是中共向蘇聯「一邊倒」路線的提出。然而，中共之所以採取「一邊倒」政策，⁵⁵實在來說，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其中概可分為下列四點說明之：⁵⁶

⁵³ 有關此四類型戰略概念，請參閱王高成，《交往與促變－柯林頓政府對中共的外交戰略》（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年），頁50-51。

⁵⁴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頁1326。

⁵⁵ 現階段中共學者普遍認知，「一邊倒」政策是中共希望在經濟政策與統一政策獲得蘇聯的協助，所採取的外交政策，完全是基於中共的國家利益來考量。戴超武、趙文洪，〈第五屆全國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學術討論會在廣州召開〉，《世界歷史》，1期（1999年），頁67-69。

⁵⁶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5-117。

第一，當時中共與蘇聯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信仰，都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以共產主義為奮鬥目標。雖然後來蘇聯走向霸權主義，但在當時，蘇聯的政治及經濟為中共提供了一個可供遵循的模式，因此中共是準備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二，美國對華政策把中共推向了蘇聯一邊。1947年1月美國杜魯門政府宣布「杜魯門主義」後，美國政府即援助自由世界各國對抗共黨的顛覆和擴張行動。蘇聯亦採取對抗行動，同年9月成立共黨情報局。因而，共產集團與自由陣營鬥爭形勢已明朗化；另一方面，中共原也希望能與英美等國建立正常關係，⁵⁷但因美國出於反共心理支持退守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乃至不承認中共政權，使得中共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可能性化為烏有。第三，從經濟角度考量也只能選擇向蘇聯「一邊倒」的方針。中共建政後，急需恢復遭受長年戰亂嚴重破壞的經濟。而為了獲得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同情、支持及援助，消除蘇聯領導人對中共的疑慮是必要的。故中共必需在「第三條道路」等問題上明確表達立場，以打消蘇聯的顧慮，爭取蘇聯的援助。第四，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更需要與蘇聯站在一邊。中蘇之間有著7000多公里長的邊界，是否能背靠蘇聯而對抗美國霸權，對處於冷戰中的中共而言，此關係到其新政權是否能存在的根本性問題。如走「中間道路」，不僅不可能緩和中共與帝國主義的矛盾，還可腹背受敵，故通過「一邊倒」。

隨後，中共政權成立兩個月以後，為了爭取蘇聯的援助，毛澤東親自前往莫斯科與史達林商討援助事宜，經過兩個半月的談判，1950年1月14日，蘇聯與中共簽定為期三十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除使中共獲得安全上的保障外，並使中共獲得三億美元的貸款，對中共政權成立之初期恢復生產及經濟發展產生極大作用。換言之，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把中蘇兩國同盟關係固定下來，清楚地說明中共將其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寄託在蘇聯霸權，即為「一邊倒」戰略在當時最大意義。⁵⁸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後，中共不久即宣布「抗美援朝」，一面派遣「志願軍」參戰，在戰略上擔任蘇聯的打手，一面在外交舞台上，聲援蘇聯。1951年5月18日，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發表對華政策演說，強調中共已淪為蘇聯的「附庸」(tributary)。⁵⁹然而，直到1953年3月5日史達林(Joseph V. Stalin)去逝，中共的「一邊倒」政策才開始調整。

綜合而言，中共「一邊倒」政策可謂處於「親蘇反美」階段。故在這一階

⁵⁷ 渡江戰役後，毛澤東曾指示劉伯承等：「如果美國及英國能斷絕和國民黨的關係，我們可以考慮與他們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詳見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83。

⁵⁸ 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17。

⁵⁹ Dorothy and Thomas Hoobler, *U.S.-China Relations since WW II* (New York: Franklin WATTS, 1981), 34. 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45。

段，有關中共外交政策分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著重在近程目標的「確保國家安全」；(2)外交政策取向：「外交聯盟」提昇到「軍事同盟」的「一邊倒」向蘇聯；(3)具體行動：包括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及參加韓戰；(4)外交行為重心：著重在蘇聯與共產集團。

另外，有關中共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中共因為初掌政權，國內情勢並未穩定，反抗之聲此起彼落，統治基礎極為脆弱，且經濟受戰火破壞尚未恢復，故在國家安全方面不得不採取「屈服」取向，一邊倒向蘇聯，以獲得經濟上的馳援。(2)外向性：因美蘇冷戰對抗態勢形成，外在威脅愈來愈大，故在擴大影響力方面則尋求與蘇聯軍事同盟的「鑽營」取向，以求對抗美國「圍堵政策」。綜合而言，此階段中共的經濟力與國防力在兩極體系下處於相對弱勢，故筆者將中共戰略類型歸納為「弱(內)弱(外)型消極守勢戰略」。

二、和平共處(1953-1959)

1950年被視為「蘇聯代理人戰爭」的韓戰爆發後，亦給予中共重新思索國家利益的機會。因為倘若沒有韓戰，中共所期待的國家利益是在一紙條約的保障下，以限制蘇聯在中國大陸的勢力範圍，並藉此全力鞏固內戰勝利果實與發展國民經濟。然而在國際現實下，中共所期待的安全利益最後卻演變成保障蘇聯安全的韓戰。換言之，在面對蘇聯安全的期望及降低蘇聯對中共的可能威脅的考量下，中共只好放棄內戰轉向韓戰，以滿足蘇聯在安全上的需求，而違背自我安全期待。⁶⁰因此，筆者認為由於當時中共處於極端劣勢國際環境下，其不得不將中(共)蘇「外交聯盟」提昇為「軍事同盟」層次，以獲得蘇聯對其的信賴。

1953年韓戰結束後，中共為突破國際關係及改善外交、經濟各方面的困境，於是發動和平攻勢，且以亞洲國家為首要對象，倡議所謂「和平共處五原則」，強調與各鄰國在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制度下，可以「和平共處」。

基本上，中共提出「和平共處」的口號，最初是受到1952年10月召開蘇共第19次黨代表大會的影響。當時中共為了配合蘇聯和平外交攻勢，1952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亞太和平會議」(Asian-Pacific Conference)，中共在會中提出「和平共處」的新路線。⁶¹1954年6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討論解決韓戰及越南問題。會後順道訪問若干亞洲國家，首途抵達印度，並於同年6月28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Pandit J. Nehru)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聯

⁶⁰ 胡喬木在其憶錄就曾提及：「朝鮮戰爭爆發後，斯大林給中國一封電報，大意說中國是朝鮮的唯一希望。事實上，我們出兵的決策是很難下的。...我們出兵是迫不得已，非常不情願的。」參閱胡喬木，《胡喬木回憶錄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87。

⁶¹ Doak A.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60), 97-98.

合聲明，即「互相尊重領土、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並強調在平等互利基礎上雙方合作。自此以後，許多亞洲與非國家在這項「和平共處」的迷惑下，與中共建立了外交關係。

其後，1955年4月18日到24日第一次「亞非會議」(又名「萬隆會議」)於印尼萬隆(Bandung)舉行。原本此次會議的目的，是加速結束殖民統治，建立新興國家和平發展的環境，而無意舉辦一次「反帝國主義」的宣傳大會，但是周恩來即利用「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與各國建立關係的基礎，爭取亞、非各國的友誼，也以這個口號作為宣傳的策略並攻擊美國破壞和平。

周恩來在大會中提出「異中求同」的口號，宣傳此一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反帝主義和殖民主義。因此，在《亞非會議公報》中採納中共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並將其擴大為「和平十原則」，乃是中共統戰活動的一大成功。甚至周恩來曾得意地聲言：「亞非會議是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的參加下，由渴望握自己命運的亞非國家舉行的，它反映了佔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亞非人民的共同願望和要求。」⁶²自此以後，中共就強調發揚「萬隆會議精神」，企圖運用亞、非國家，作為反美統一戰線的工具。因此，當時中共的統戰口號是「反帝」，主要敵人是美國，而「反帝」的主要聯合對象為亞、非洲國家。此期間先後計有尼泊爾、埃及、敘利亞、葉門、伊拉克，幾內亞、摩洛哥、蘇丹，阿爾及利亞等國與其建交。

另一方面，隨著中共國內情勢的逐漸穩定，1955年7月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共第一個五年計畫經濟(以下簡稱「一五計畫」)。其主要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我國設計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⁶³其中，中共從中獲得最重要的資源就是蘇聯的技術與經驗。⁶⁴然而，1956年2月，蘇聯赫魯雪夫(N. S. Khrushchev)在考量國家利益下，於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正式宣告「和平共存」外交政策，主張和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和平競賽」之後，⁶⁵中共與蘇聯便斷斷續續發生爭執。到了1959年蘇聯更不顧中共的反對，片面廢止了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停止協助中共發展核武器，以及於翌年撤退所有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顧問與技術人員。另一方面，其又與美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舉行大衛營會議，造成中共的猜疑

⁶² 五項原則的措詞後來稍有改變。在1954年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在亞非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的發言中，「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⁶³ 孫健，《中國經濟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637。

⁶⁴ 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1999), 112-113.

⁶⁵ 赫魯雪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總結報告〉，《匪俄爭執原始資料彙編(一)》(臺北：國家安全局編印，1964年)，頁22-27。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47。

與不安，進而加速中(共)蘇雙方之間分裂。⁶⁶爲此，「和平共處」階段乃告一段落。

由上述可知，在此階段有關中共外交政策分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逐漸由「確保國家安全」的近程目標朝向「建立國際影響力」的中程目標發展。(2)外交政策取向：在這一時期中共外交戰略受到韓戰的刺激，欲由依靠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聯盟」政策，朝向自行走出爲「和平共處」的「外交結盟」道路。(3)具體行動：與蘇聯建立密切的經濟、技術合作關係及聯合亞、非國家並建立正式關係；同時採取軍事行動對抗退守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54 年一江山、大陳島戰役及 1958 年金門八二三砲戰。(4)外交行爲重心：主要在亞、非洲國家。⁶⁷

另外，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由於國力仍然不足，在經濟上仍須依重蘇聯支援及協助，無法直接向蘇聯說「不」，故在國家安全方面，仍持續「屈服」取向。(2)外向性：由於處於緊張的兩極體系且軍事力仍不足以對抗外來威脅(主要爲美國)，故在擴大影響力方面，仍只能在外交上趨附勢力(bandwagon)，配合蘇聯政策，並開始對第三世界採取反美統一戰線，以達到權力平衡，故開始轉化爲「操縱」取向。綜合而言，此階段其經濟力及國防力雖有所提升，但綜合國力仍不足以對抗外來威脅，故此階段中共戰略類型屬於「弱(內)強(外)型消極守勢戰略」。

三、中間地帶論(1959-1966)

造成中蘇共分裂的原因很多，大體不外意識型態(ideology)和國家利益的雙重衝突。1960 年 6 月 20 日，羅馬尼亞工人黨舉行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又稱爲「布加勒斯特會議」)中，赫魯雪夫在會中攻中擊中共爲「教條主義」(dogmatism)，並散佈八十頁的小冊子批評中共，中蘇兩黨分歧公開化。同年 6 月 26 日，中共代表彭真在隨後召開的「兄弟黨會議」上也散發書面聲明，指蘇聯是「修正主義」(revisionism)。⁶⁸進而在 1960 年 11 月莫斯科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共黨大會中，中共與蘇聯又發生激烈爭論。⁶⁹

⁶⁶ Hinton 教授認爲赫魯雪夫終止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剛好收到反效果，使中共更痛恨蘇聯。轉引李登科，〈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外交政策分析〉，收錄於《鉅變與未來—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大陸情勢》，趙倩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0)，頁 192。

⁶⁷ 依共產黨傳統觀念，「和平共處」只適用於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之間，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國家和壓迫國家、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之間，均不適用。

⁶⁸ Edmund O. Clubb, *China and Russia: the "great gam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83.

⁶⁹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4 年)，頁 44。

由於中(共)蘇情勢的詭譎多變，故中共在 1960 年初，遂由意識型態開始著手調整外交政策，即提升所謂「中間地帶論」，強調以建立「毛澤東思想」來取代「馬列主義」，進而武裝自己。⁷⁰

事實上，在此階段中共所強調的「中間地帶論」，它最早見之於 1946 年 8 月毛澤東和美國女記者史特朗(Anna L. Strong)的談話中，毛澤東當時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離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這裡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我相信，不要很久，這些國家將會認識到真正壓迫他們的是，是蘇聯還是美國。」⁷¹雖然這是屬於「一邊倒」的說法，因當時中共政權還未成立，它必須依賴蘇聯的支持，但「中間地帶論」的概念已開始蘊育而生了。

到了 1964 年，基於上述中共與蘇聯關係日益惡化，中共便將前述的「中間地帶論」做了一些修正而成爲新的「中間地帶論」。有關修正說明如下：⁷²

第一，中間地帶的劃分變更了。根據 1964 年 1 月 21 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這個極遼闊的中間地帶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亞、非、拉丁美已洲已經獨立和正在爭取獨立的國家，這是第一個中間地帶；另一部分是整個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陣營，這是第二個中間地帶。」⁷³第二，中間地帶的性質有了改變。中間地帶不再是美國進攻蘇聯的緩衝地帶，而是被美國直接侵略的目標；因爲它們認爲美國在「反蘇反共」的煙幕下，到處建立軍事基地、組織軍事集團，進行顛覆活動，鎮壓人革命鬥爭，力圖首先奪取介乎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廣闊中間地帶。第三，中共對兩個中間地帶並非同等看待。它們顯然把第一中間地帶看做是反帝反殖，也就是反美統一戰線的主力；而第二中間地帶的國家，有兩重性，它說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

由上可知，中共在提出新「中間地帶論」時，雖然正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發生齟齬與對立，但是中共當時基於根深蒂固的反帝意識形態，以及國際體系結構的變遷(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出現裂縫)，仍將美帝視爲最主要的敵人，蘇聯爲次要敵人，而西歐、大洋洲和加拿大等資本主義國家陣營則爲更次要敵人。因此，中共的「中間地帶論」是一種「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是講求矛盾的各方面暫時在某一共同要求下，爲了對抗某些共同敵人而組成的「矛盾統一體」。固然，中共在這段期間仍與蘇聯具有軍事同盟條

⁷⁰ 錢剛鐔，《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3 年)，頁 66。

⁷¹ 楊金柱，〈中共戰略外交與戰爭觀〉，《東亞季刊》，18 卷 4 期(1987 年 4 月)，頁 77。關於談話內容參見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四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年)，頁 1087-1092。

⁷² 尹慶耀，《中共的統戰外交》(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 年)，頁 45-47。

⁷³ 社論，〈全世界一切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力量聯合起來〉，《人民日報》，1964 年 1 月 21 日，版 1。

約關係，但該項同盟其已逐漸名存實亡。⁷⁴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提出「中間地帶論」的同年 10 月 16 日也完成首次核子試爆，使得中共即跨過核子門檻，躋身為世界第五個擁有核子武器的政權，⁷⁵其國家安全因而獲得基本的保障。換言之，「中間地帶論」也為中共開始「獨立自主」地走中國式外交革命的道路提供了理論依據。另外，由於「一五計畫」的成功，⁷⁶使得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漸漸穩固，亦促使中共賡續推動一連串五年計畫經濟。

綜合上述，在中共在「中間地帶論」階段，有關外交政策分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因擁有核武而設定以實現對抗美國這個超級強權為主，進而實現「世界革命」的長期目標。然而，筆者認為以中共當時國力並不足以對抗美國，更遑論「世界革命」，故其外交政策實質目標應為處於由「確保國家安全」的近程目標朝向「改善本國經濟」及「增加本國威望」的中程目標才是。至於「統一中國」的近程目標，則因 1958 年爆發金門八二三砲戰後，凸顯中共實力不足而暫時擱置。(2)外交政策取向：具有加速朝著「反美反蘇」的「外交結盟」前進，以增進中共國際影響力。(3)具體行動：包括批判美、蘇兩國，爭取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新興國家，以及拉攏對蘇聯不滿的共黨國家。為「團結第一中間地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孤立打擊帝國主義勢力」。(4)外交行為重心：在亞、非、拉丁美洲等地區。

另外，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此階段中共由於國力不斷增加，且擁有核武能力，因此敢於直接向蘇聯說「不」，並在外交上逐漸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不再完全配合蘇聯政策。然而在國家安全方面，中共自知綜合國力尚不足同時應付反美反蘇，為避免陷於「兩面作戰」之窘境，故由「屈服」轉化為「鎖國」取向；(2)外向性：由於「中間地帶論」採取「外交結盟」類型，故在擴大影響力方面，隨著其國力日增而更朝向「操控」取向。綜合分析，此階段的中共戰略類型雖仍為「消極守勢戰略」。不過，在經濟力及國防力等動員國家資源的程度上已由「弱」逐漸轉「強」，故此階段中共戰略類型屬於「強(內)強(外)型消極守勢戰略」。

四、文革造反(1966-1969)

⁷⁴ Doak A.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48-49.

⁷⁵ 轉引吳建德，《中國威脅論：後冷戰時期中共軍備的擴張》(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6年)，頁 173。

⁷⁶ 「一五計畫」經濟成長率根據中共官方發表的數據是 18%，比預期中的 14.7%好，而西方國家保守估計也在 16%。若以 1957 年的統計，中共工業總產值增長 128.6%，參閱國家統計局編，《偉大的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年)，頁 23、195。

從 1966 年至 1969 年，中共發動「造反外交」，在北京等各大城市掀起排外狂潮，並向其他國家輸出紅衛兵暴亂，以致與許多國家發生糾紛與衝突，並與非洲五個國家中止或斷絕外交關係，使中共對外關係陷入停頓與排外。

事實上，中共紅衛兵於 1966 年 8 月 18 日成立後，毛澤東曾親予接見，隨即展開一連串批鬥與破壞活動。紅衛兵高喊「破四舊」口號，以反傳統、反政府、反現有秩序，推動「造反外交」，襲擊外國使館，毆打外國記者、學生，羞辱外國使節。紅衛兵除在大陸內部大肆製造反外鬥爭外，並在世界各地進行「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運動，散佈毛語錄，毛像章，實行「革命輸出」。⁷⁷中共這種近乎非理性的作為，誠如辛頓教授(Harold C. Hinton)所言，可以稱為「紅衛兵外交」。⁷⁸

日本教授笠原正明則認為，中共在此時期的外交政策顯然是以「世界革命」為依歸。⁷⁹然而就紅衛兵攻擊外國人使館及外國人士的舉動，以及中共召回駐外使節與驅逐外國學生等舉動來看，中共這些作法顯然與「世界革命」格格不入。因此，在紅衛兵外交之下的中共外交政策傾向其實是自我孤立，並缺乏明確的目標。⁸⁰進而言之，筆者認為此階段乃是毛澤東為鞏固個人權力地位，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的荒謬時代。

1969 年 3 月 2 日中共與蘇聯在珍寶島爆發武力衝突，中共因以升高「反蘇」鬥爭。同年 4 月中共召開「九全大會」，林彪在政治報告中，聲言「絕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危險性。我們要作好準備，準備他們大打，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⁸¹並通過「新黨綱」，其總綱中明白規定對外要「打倒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打倒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⁸²這就是有名的「三反路線」。

1969 年 4 月 24 日中共更於大會結束後發表的新聞公報中強調：「我們一定要同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在一起，同全世界擴大無產階級和各國革命人民團結在一起，徹底粉碎美蘇勾結妄圖重新瓜分世界的陰謀，把反對

⁷⁷ 尹慶耀，《中共外交與對外關係》(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3 年)，頁 42。

⁷⁸ Harold C. Hinton, *Communi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66), 154.

⁷⁹ 笠原正明，〈中共外交四十年的總結—從反體制活動的視點觀察〉，《中國大陸研究》，31 卷 11 期(1989 年 5 月)，頁 63。轉引李登科，〈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外交政策分析〉，收錄於《鉅變與未來—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大陸情勢》，趙倩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0)，頁 194。

⁸⁰ 李登科，〈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中共外交政策分析〉，收錄於《鉅變與未來—1989 年天安門事件之後的中國大陸情勢》，趙倩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0)，頁 194。

⁸¹ 〈評 60 年代末中國的大戰備〉，《中國社會科學院網》，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26.htm

⁸² 〈中國共產黨章程〉，《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089/5101/20010428/454635.html>

帝、修、反的偉大鬥爭進行到底」。⁸³隨後，中共逐漸恢復外派「大使」，一方面自行解除外交孤立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為進行「三反」的統戰外交佈局。

綜合言之，中共在此「造反外交」階段中，不但引起世界各國的反感並造成與若干國家之間關係瀕臨於破裂，甚至與共產國家關係亦趨於惡化，使得中共在這一階段的外交形勢處於非常孤立境地。因此，此階段有關中共外交政策分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中共雖欲以「世界革命」，並埋葬「帝、修、反」為目標，但因內部政局動蕩不安，故筆者認為此階段又退回「確保國家安全」的近程目標。(2)外交政策取向：「自我孤立」(self-isolation)。(3)具體行動：處於停滯、排外狀態。(4)外交行為重心：毫無重心，邦交國紛紛與其斷交。

另外，就安全政策分析：(1)內向性：仍維持「鎖國」取向；(2)外向性：完全停滯，甚至連「鑽營」取向亦談不上。故中共戰略可說處於「維持政治現狀」的態勢，在動員國家資源的程度上又因政治上的動蕩而停滯不前，甚至逐漸轉弱。換言之，此階段中共戰略類型乃為「強(內)弱(外)型消極守勢戰略」。

五、三個世界論(1969-1982)

由於自中(共)蘇分裂後，蘇聯即開始逐步增強西伯利亞遠東的軍事力量，使中共逐漸感受蘇聯強大的軍事壓力。1968年蘇聯率大軍進軍捷克，並宣布「共黨國家主權有限論」的「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此項理論與行為使中共對蘇聯更加疑懼。1969年3月中蘇共雙方爆發「珍寶島事件」，蘇聯積極籌組「亞洲安全體系」對中共進行包圍，使中共感受到蘇聯已產生明顯與急迫的安全威脅。

進入1970年代，蘇聯利用美國深陷越戰泥沼之機，加緊在世界各地擴張，推行全球攻勢戰略。此時，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美國自亞洲撤退的「關島宣言」(Guam Doctrine)，而將主力放在歐洲及中東，美國全球戰略遂由攻勢轉入守勢，亦沖淡了美國對中共安全威脅的嚴重性，而蘇聯則由守勢轉入攻勢。⁸⁴因此，在中共觀點裡蘇聯已轉為主要敵人，美國降為次要敵人。故在1960年代末期，毛澤東、周恩來就大力扭轉了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惡劣影響，使中共外交工作走上了正軌，並審時度勢，提出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聯美抗蘇」的外交戰略。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會見美國國務卿季辛吉時提出，「我說要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⁸⁵即

⁸³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秘書處新聞公報(閉幕)〉，《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089/5101/20010428/454603.html>

⁸⁴ 任曉、胡永浩，《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104。

⁸⁵ 毛澤東，《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頁179。

這些處於同一緯度的國家應連成一條戰略線。後來，毛澤東在 1974 年 1 月 5 日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除了談「一條線」，還談到「一大片」的思想。即除了上述一條線國家外，還要把這條線外的亞非拉一大片國家都團結起來，共同對付蘇聯霸權主義行徑。顯然，這對中共的生存和發展(特別是國防鬥爭和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突破了以意識形態區分敵友的思維模式，而將國家安全、民族利益作為制定戰略的基點，這與 1950 年代的「一邊倒」戰略有顯著不同。雖然「一邊倒」在政治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意識形態的考慮則居於主要地位；而「一條線」、「一大片」的戰略思想則把國家安全利益、民族利益的考慮放在首位，主張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的聯合。這一思想轉變，是中共戰略走向成熟的標誌，具有深遠的意義。

其次，「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思想的實施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共的安全環境。從世界範圍來看，「一條線」和「一大片」國家的聯合，特別是中(共)美在「抗蘇」基礎上形成的戰略聯合，改變了國際政治地圖和美蘇力量對比。蘇聯為改變這一不利態勢，不得不加大軍備發展的力度，結果使蘇聯經濟和軍事的關係出現較大偏差，影響了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為導致蘇聯衰退的原因之一。「一條線」、「一大片」戰略對中共的影響力更為直接，它使中共解除了兩面作戰的壓力，改善了周邊政治環境。同時，中(共)美關係的正常化大大推動了中共與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結束了被封鎖、被遏制的歷史，為中共在 19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

因此，在「反蘇為主，反美為次」的原則下，中共在 1970 年代初期開始加速展開與美國的接觸，採取「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而「聯美反蘇」當然是其策略下的結果。不過，筆者認為，「聯美反蘇」政策只是「反蘇」統一戰線的表現，而所謂「聯美」更不同於 1950 年代的「聯蘇」，前者意指「外交聯盟」，後者意指「軍事同盟」關係，在程度上仍有些許差異。

由於 1978 年 11 月，越南與蘇聯簽定了軍事同盟條約，年底越南大舉進攻柬埔寨，趕走了親中共的波布政權，蘇聯也終於在亞太取得大肆擴張海空軍的據點。另一方面，中共於 1978 年 12 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成為實質的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便成為中共的基本路線，而這也是鄧小平發展國家戰略的核心，即「經濟建設」是一個中心，是發展的根本任務，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而「改革開放」及「四項基本原則」是兩個基本點，⁸⁶彼此互相聯繫，共同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統一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

⁸⁶ 四項基本原則：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三、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詳見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64-165。

爲此，當時美國卡特(James Earl (Jimmy) Carter)總統鑒於蘇共在亞洲勢力的突破及中共改革派上臺，竟在未照會美國國會的情形下，猝然於 1978 年 12 月 25 日宣布將於 1979 年 1 月 1 日與中共建交，以致於中(共)美在經過長達 30 年「磨合期」後，終於完成雙方關係正常化。進而於 1979 年 1 月，鄧小平訪問美日兩國，大肆呼籲「反霸」，「北京－華盛頓－東京」抗蘇軸心的儼然形成。故顯見此階段後期，中共外交政策取向已改變由「外交結盟」而爲「外交聯盟」。

綜合而言，在「三個世界論」時期，有關中共外交政策分析如下所述：(1)前期外交政策取向爲「外交結盟」，後因與美國建交，「聯美抗蘇」戰略成形，故後期轉變爲「外交聯盟」。(2)外交政策目標：其在於實現防止蘇聯攻擊，以達「確保國家安全」的近程目標。(3)具體行動：則爲拉攏美國及日本西方國家共同對抗蘇聯及其幫凶，其次亦呼籲第三世界國家抵抗蘇聯霸權主義。(4)外交行爲重心：前期著重在第三世界，後因與西歐、美國關係改善，故重心轉移至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中的美國。

另外，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所述：(1)內向性：實施「改革開放」可謂對中共經濟體制重大轉變，但在政治制度在仍持續社會主義道路，故在國家安全方面，可謂由前期的「鎖國」轉變爲後期的「芬蘭化」取向。(2)外向性：透過「聯美抗蘇」戰略，逐漸提高對外影響力，而處於「操控」取向。綜合而言，中共此時期全力發展經濟現代化建設，對於軍事現代化建設則爲四個現代化之末，故其戰略已由「強(內)強(外)型消極守勢戰略」轉化爲「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戰略」。

六、獨立自主外交(1982-1989)

1970 年代中後期，蘇聯在第三世界攻勢凌厲，而美國對此反應，似乎軟弱無力。時移勢易，美國原先在波斯灣地區的橋頭堡－伊朗於 1979 年 2 月發生了一場伊斯蘭革命，親美政權被推翻。同年 11 月 4 日，伊朗革命派學生扣押美國駐伊大使館人員，引發一場「人質危機」。美伊關係迅速惡化，伊朗由親美國家變爲反美國家。然而，正當美國營救人質行動失敗，無計可施，全世界皆高度美伊情勢變化時，蘇聯於同年 12 月 27 日出其不意地出兵阿富汗，使得蘇聯的全球攻勢戰略達到了頂峰。⁸⁷

而在這種全球攻守之勢下，中共、美國強烈地感受到一種共同威脅，亦使中(共)美合作關係達到一個新的頂點。雙方不但對阿富汗反蘇游擊隊提供援助，而且建立更密切地安全與軍事合作關係。除了美國開始對中共軍售，中共允許美國在中國大陸設立電子監聽站。同年北京通知莫斯科，《中蘇友好同盟互

⁸⁷ 任曉、胡永浩，《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04。

助條約》於 1980 年 4 月期滿後，不再延長。⁸⁸

1981 年美國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總統上任後，對蘇聯採取強硬立場，即以軍事戰略為中心思想，聯結中共抵制蘇聯，因此美蘇關係日益僵化。然而，1982 年 3 月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在中亞塔什干(Tashkent)發表重要談話，提出與中共改善關係的建議，中共立即予以回應，中蘇關係遂開始緩慢解凍。⁸⁹同時，中共亦發覺儘管其在 1970 年代對「大三角」的處理深得現實主義之奧妙，但鑒於美、蘇兩強態度的反覆無常，故使得中共更加堅定其對「發展中國家」的認同和獨立自主的想法。⁹⁰

因此，為了獲取在「北京－華盛頓－莫斯科」三角關係中最有利的樞紐地位，同時也為了建立一個推動經濟改革所需的國際環境，於是 1982 年 9 月中共舉行「十二大」，宣佈不與任何國家結盟，而改採取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⁹¹自此，原先向美國傾斜的外交，轉為比較平衡的外交路線。⁹²

一般而言，所謂「獨立自主」外交政策是根據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會議上，鄧小平在開幕詞中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力。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⁹³

1986 年 3 月 25 日中共總理趙紫陽在中共「六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報告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草案的報告」時，更將「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主要內容和基本原則歸納為十個方面。(見表 2-2)

表 1-2：冷戰時期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方針

原則	內容
1. 外交目標	重申中共對外工作的根本目標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共同經濟繁榮」。
2. 反霸	主張所有國家不論大小、貧富、強弱一律平等，堅決反對以大欺小、以

⁸⁸ 轉引高朗，〈後冷戰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之變與不變〉，《政治科學論叢》，21 期(2004 年 9 月)，頁 24。

⁸⁹ 任曉、胡永浩，《中美日三邊關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06。

⁹⁰ 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 8 月，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918

⁹¹ Carol Lee Hamrin, "China Reassesses the Superpowers," *Pacific Affairs* 56 (Summer 1983): 209-216.

⁹² 中共十二大改變外交政策，強調獨立自主，有部份西方學者認為是中共黨內派系爭鬥妥協的結果，參考 Carol Lee Hamrin, "Competing 'Policy Packages' in Post-Mao China," *Asian Survey* 24 (May 1984): 487-518.

⁹³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shizheng/252/5089/5104/5276/20010429/455579.html>

	富壓貧、以強凌弱。各國的事由各國人自己管，世界上的事應由各國協商解決，不能由一兩個超級大國說了算。並稱「中國決不稱霸，也反對來自任何方面和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
3. 堅持獨立自主	堅持「獨立自主」，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中共的態度和對策，並以是否有利於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
4. 不結盟	決不依附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也決不同其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謀求與美國關係在嚴格遵守歷次雙方「公報」所規定的原則基礎上穩定發展；與蘇聯關係在採取實際行動消除三大障礙的過程中切實改善。
5. 和平共處	信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恢復和發展正常關係，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來決定親疏、好惡。反對任何國家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作藉口，佔領別國的領土，干涉別國內政。
6. 加強與第三世界合作	宣稱中共屬於「第三世界」，堅持把加強和發展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為其對外工作的基本立足點。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鬥爭，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民族經濟，謀求改善南北關係和發展「南南合作」的努力。
7. 反對軍備競賽	反對軍備競賽，反對把這種競賽擴到外層空間。重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之立場。
8. 對外開放、平等互利	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不斷擴大和發展同各國的經濟、貿易、技術交流與合作。開放政策面向全世界，既對資本主義國家開放，也對社會主義國家開放；既對發達國家開放，也對發展中國家開放。
9.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支持聯合國組織根據憲章精神所進行的各項工作，積極參加聯合國及專門機構開展的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活動。
10. 與各國積極交往	重視各國人民間的交往，鼓勵和支持各群眾團體、民間組織和各界人士開展各國在經濟、文化、教育、科技、新聞、衛生、體育等各個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加強各國人之間的瞭解和友誼。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參考《共匪原始資料彙編(五十三)：中共「十三大」專輯》(臺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局編印，1985年)，頁11-54。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中共首次提出外交政策十項基本原則，從中不難發現中共之外交政策已有幾項重大轉變，尤其將對外開放政策，反對軍備競賽，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等納入外交政策。事實上，中共之所以採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如下：⁹⁴

⁹⁴ 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第一、爭取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使其現代化建設得以順利實施，以培植「反霸鬥爭」的實力。鄧小平說：「中國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沒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是不行的」，即是證明。

第二、在美、蘇之間保持最大的彈性，既不因發展與美國關係而冷卻與蘇聯關係，亦不因與蘇聯緩和而疏遠美國；既不必依據美國意圖考慮對蘇政策，亦不必依據蘇聯意圖考慮對美政策。同時還可以在反對美、蘇「霸權主義」的鬥爭中，與其改善或發展關係；在改善或發展關係的過程中，繼續進行「反霸鬥爭」。質言之，中共意圖靈活游移於美、蘇間，採取主導性的既不偏於美國也不偏於蘇聯的彈性政策，以獲得最大的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之實際利益。

第三、爲了消弭第三世界對中共接近美國的不滿情緒，並繼續拉攏第三世界，建立「第三世界代言人」地位，在國際政治中形成「第三勢力」，以作爲它在美蘇爭霸下的政治資本。

第四，是利用中國大陸的天然資源及十億人口潛在市場，向全世界「門戶開放」，以謀其「四化建設」所需要的資金、科技與設備。

事實上，自從中共在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工作重點置於「四個現代化」(以下簡稱「四化」)建設時，在外交政策上就開始摸索一條可以適應國內與國際環境變化的新途徑，其既可以獲得「四化」所需要的科技和資金，又可以減低安全上的威脅，使中共在美、蘇兩強之間持彈性與主動地位，以獲取最大的利益。⁹⁵因此，中共與美國建交，最初目標是「聯美抗蘇」及獲得「四化」所需資金、科技。不過，當中共發現非但不能達到這二項預期目標，反而引起蘇聯疑懼與報復時，如何化解蘇聯的猜疑，避免緊張的升高，但又能塑造進行「四化」的有利國際環境，可謂是促成中共採取「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主要因素。

換言之，在這項新政策下，中共對美、蘇的性質和地位進行深刻的再認識，否定在美、蘇兩國之間聯合一方以反對另一方之戰略構想，並決定不與任何一方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以在美、蘇之間保持最大之獨立性和彈性。因此，中共一方面與美、蘇兩國維持近乎等距離的友好關係，即所謂施展「既聯美聯蘇，又反美反蘇」的兩手策略；⁹⁶或者所謂平衡「雙重敵對政策」(dual-adversary policy)與「雙重和平共處政策」(dual-peaceful coexistence policy)。⁹⁷故中共這項外交政策的傾向幾可列爲「不結盟」，即不依附於任何一個強權，目標則是發展國內經

年 11 月)，頁 192。

⁹⁵ 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ed. Harry Harding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8-201.

⁹⁶ 《匪情年報》(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85 年)，頁 2-187。

⁹⁷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Mass.: Little Brawn, 1977), 8.

濟，提昇國際地位及參與地區性質與國際性合作活動。⁹⁸

綜合而言，在「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階段，有關中共外交政策分析如下：
(1)外交政策取向由「外交聯盟」轉變為「不結盟」。(2)外交政策目標在於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遠程目標。(3)具體行動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4)外交行為重心努力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作用。⁹⁹

另外，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持續處於「芬蘭化」取向，重心置於發展國內經濟建設。(2)外向性：透過「不結盟」，與美、蘇兩國保持等距外交，事實上則持續處於「操控」取向，並藉此提高對外影響力。綜合而言，中共在此時期經濟力仍處於向上提升，國防力則處於維持現狀態勢，故其戰略仍屬於「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戰略」。

七、反和平演變(1989-1996)

進入後冷戰時代，國際體系架構下則由「兩極化」轉變為一種以美國主導的「單極為主的多極體系」。¹⁰⁰中共雖然承認美國一極獨大，但並不希望由美國獨占主導國際事務之權。¹⁰¹因為若由美國全盤掌控，中共便難以繼續扮演「平衡者」角色而從中獲利。故中共認為，相較於單極體系，其可以利用世界走向多極化，美、歐矛盾與競爭日益擴大，獲取更多利益。¹⁰²因此，多極化格局基本上是中共對後冷戰時期國際情勢的客觀判斷，也是主觀上的期待與努力的方向。

進入後冷戰時期，中共對外仍然延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過相較於1950年與1966年分別因為參加韓戰與爆發文革所引發的兩度外交挫折，1989年「六四事件」則對中共的國際形象帶來更嚴重打擊，並使其在國際社會陷入空前孤立。不僅其受到國際輿論和海外民運人士站在人道與民主立場的控訴與撻伐，同時美、日、法、英等國對中共也實施不同程度的經濟制裁，使得中共國際形象嚴重敗壞。

1989年春至1990年夏，隨之而來的東歐、蘇聯發生驟變，並採取多黨競爭制度取代共黨專政。面對這些劇變，鄧小平等多位中共元老多次集會，決定採

⁹⁸ Robert Delfs, "Racist Mob Mentalit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43, 12 January 1989, 12.

⁹⁹ 鄭為之，〈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國際問題研究》(北京)，4期(1984年4月)，頁4-7。

¹⁰⁰ 後冷戰時期，研究國際體系轉變最著名的學者當首推杭廷頓，請見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33 (January/February 1991): 6

¹⁰¹ "Toward a New World Ord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 1 (September 17, 1990): 91-92. 轉引周煦，〈十四大後的中共外交政策：持續與轉變〉，《中國大陸研究》，36卷1期(1993年1月)，頁58。

¹⁰² Bonnies, Glaser,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s: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Asian Survey* 33 (March 1993): 253.

取多種措施以應付國內外的變局，其中包括：(1)堅持一黨專政和四個堅持，避免內戰及混亂；(2)打破國家孤立，重建國際交往，拉攏第三世界；(3)否定戈巴契夫的作為。¹⁰³因此，「六四事件」發生後，對中共所處的國內外環境產生了重大變化，導致在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上必須有所「調整」。

事實上，由於 1979 年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不僅扭轉中共經濟結構，同時也逐漸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再加上 1982 年「獨立自主」的提出，使得原本旨在使中共從政策上開放與美、蘇兩強之交流，以淡化意識型態方面的色彩，遂漸漸轉化成挑戰權威的想法。¹⁰⁴因此，中共認為「六四事件」與社會主義圈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推動「和平演變」的結果。¹⁰⁵

尤其是美國運用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援助，將其與體制變化互相綁在一起的戰略，具體的表現即為促進並獎勵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多元化及市場經濟化的過程。其中，援助社會主義開放的過程，甚至被中共學者批判為「(老)布希主義」(Bushism)。¹⁰⁶故自 1989 年「六四事件」後，「獨立自主」的調整是中共防止西方「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能力和意志。

在這種認知下，中共一方面要改革開放，以促進經濟發展，避免社會主義經濟的危機；另一方面，又擔心西方「精神污染」和「和平演變」戰略。因此，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中共提出要「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¹⁰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種情況下，使得「深化改革開放」政策及「反和平演變」成為中共的兩大工作任務。¹⁰⁸換言之，中共雖再三表示改革開放及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不會改變，且絕不會回到閉關鎖國的老路，但卻一口咬定中國大陸發生民主運動有「外國勢力插手」，即所謂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勾結國外某些敵對勢力掀起的一場有計畫，有組織，有預謀的活動，目的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

¹⁰³ 陳慶，〈四十年來的中共外交〉，收錄《海峽兩岸四十年》，華力進、雷飛龍編(臺北：革命實踐研究院，1994年)，頁306-307。

¹⁰⁴ Orville Schell, *Discos and Democracy: China in the Throes of Reform*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8), 132。

¹⁰⁵ 根據中共的說法，美國所推動的「和平演變」戰略概念，原是由 50 年代由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所提出。正當韓戰結束後，中共提出「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杜勒斯透過公開的國家政策宣告闡明：「今後美國的政策是對蘇聯、東歐、中共等社會主義國家漸進地展開自由化，直到第三、四代這些國家將達到資本主義化程度。」

¹⁰⁶ 《聊城師範學報》(哲社版)，第 5 期(1990 年)，頁 68-73。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1982-1992)〉(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11 月)，頁 203。

¹⁰⁷ 趙紫陽，〈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共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網》，1987 年 10 月 25 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7061.htm

¹⁰⁸ 畢英賢，〈國際情勢下的中共外交〉，收錄《國際情勢下的中共外交》，張隆義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2 年)，頁 182-183。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 11 月)，頁 203。

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中華人民共和國。¹⁰⁹

因此，中共面臨對社會主義國家不利的國際動蕩局勢，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的戰略方針，¹¹⁰其後又提出「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有所作為」。¹¹¹其中以「韜光養晦」作為外交方針的核心，使中共在變動的國際環境中，作為站穩腳步的基礎點，並重申了一些政策與原則：¹¹²

第一、國權高於人權。「六四事件」之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中共侵犯人權的旗幟，再一次向中共實施制裁。對此，鄧小平看得非常明白，他再次重申「國權高於人權」的觀點。他說：「人們支持人權，但不要忘記還有一個國權。」¹¹³「國家的主權、國家的安全要始終放在第一位，對這一點我們比過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國家拿什麼人權、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實際上是要損害我們的國權。搞強權政治的國家根本就沒有資格講人權，他們傷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¹¹⁴

第二、不以意識形態論親疏，堅持改革開放。東歐共產國家與蘇聯劇變露出苗頭之後，西方國家加強了意識形態攻勢。為此，鄧小平指出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考慮國際關係應該著眼於有關雙方的長遠的戰略利益，不以歷史恩怨論親疏，也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論親疏，世界各國應該相互尊重，平等對待。另一方面，他又告誡人們要警惕西方的意識形態攻勢。

第三、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隨著兩極化格局逐漸走向終結，國際形勢反而不如兩極時期簡單明瞭，且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鄧小平經過長期深入地觀察、思考和分析，繼總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十二字戰略方針之後，又指出在新舊格局交替之際，世界兩大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甚至發展問題還有所惡化。因此，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既是確實需要的，又遇到不少阻力，必須不斷強調。

「六四事件」後，中共於 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緊急在北京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認為，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中共中央的決策及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除此之外，亦對中共中央領導人事進行調整，包括撤銷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黨內一切領導職務、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總書記。同年 11 月 6 日至 9 日召開「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辭去中共

¹⁰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413。

¹¹⁰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21。

¹¹¹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63。

¹¹² 查君紅，〈中國戰略利益：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判定之比較〉，《世紀中國》，2003 年 4 月 18 日，<http://www.cc.org.cn/zhoukan/zhonguoyanjiu/0304/0304181007.htm>

¹¹³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31。

¹¹⁴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頁 348。

中央軍委會主席職務，並由江澤民接任。¹¹⁵換言之，在鄧小平決心建立領導人體制及深化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順利產生以江澤民為中共第三代集體領導核心。為此，江澤民亦延續著鄧小平政策，繼續執行中共「十三大」確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改革開放路線，加速推動經濟改革。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為突破外交僵局，總理李鵬要求外交戰線幹部做到「方針不變，克服困難，堅持原則，多做工作」。¹¹⁶同時，江澤民強調社會主義安全體制下的改革，並說：「世界社會主義的衰退不過是一時性現象，中國絕不能拋棄共產黨的權力獨占。」¹¹⁷其亦要求外交人員在國際間複雜的政治鬥爭中保持警惕，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並提出「既要講經濟，又要講政治；既要講友好，又要講鬥爭；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的「兩點論」，作為外交工作的指導原則。¹¹⁸

事實上，從中共的分析看「和平演變」的因素有來自內部和國際的部分，故中共反「和平演變」的對象和措施，也包括了中國大陸內部和國際方面兩個部分。有關內部方面，以加強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及強化高壓統治為主要措施。有關國際方面，中共特別提出下列六項努力方向：¹¹⁹

第一，以「和平共處五原則」抗拒「和平演變」，以互不干涉內政作為抗拒利器，由大原則著手反「和平演變」。

第二，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和平演變」，並擴大南北矛盾為「和平演變」減壓。

第三，由理論歷史事實面來否定西方人權觀，加強思想整備，擴大宣傳美國種族問題，減少自我被打擊面。人權問題對話只是中共反「和平演變」之手段，與實踐無關。

第四，加強與各社會國家間政黨聯繫。

第五，反「和平演變」亦應注意涉外工作保密問題。

第六，擴大改革幅度，改善國際觀瞻。

其後，東歐共產政權垮台，美、蘇及北約組織、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TO；以下簡稱華沙組織)和解，冷戰結束，世界形勢趨於緩和。鄧小平雖提出「冷靜觀察，穩定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

¹¹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13。

¹¹⁶ 馮志，〈從「十四大」看中共對外關係〉，《中共研究》，26卷11期(1992年11月)，頁55。

¹¹⁷ 《文匯報》，1989年7月7日，版2。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204-205。

¹¹⁸ 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1982-1992)〉(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205。

¹¹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會，《大陸情勢專題研究》(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92年)，頁22-26。

當頭」的二十四字箴言，¹²⁰以適應變局。但中共外長錢其琛卻認為「緩和不是沒有鬥爭，也不等於穩定。在緩和的總趨勢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意識型態之間的鬥爭變得更加複雜、激烈」，「以對話替代對抗，只是鬥爭方式的轉變，而絕不是鬥爭本質的轉移」。¹²¹足見中共的對外工作具有強烈之鬥爭性和多變性。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曾對於「六四事件」提出：「這個風浪是遲早會到來的，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無法以人們的意志加以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¹²²筆者認為，此亦反映出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對於其外交政策取向可能會由體制局部改革的「芬蘭化」轉化為更強烈政治制度改革的「革命」，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過，由於「六四事件」後，江澤民領導權威尚未完全建立，內部保守派與改革派相互角力，使得中共對於改革開放的程度多投鼠忌器。有鑒於此，鄧小平特別於1992年1月19日南巡時，提出「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其主要三個重點：一、強調改革開放；二、釐清姓「社」、姓「資」等問題；三、全面開展經濟建設。自此，中共更加速一連串改革開放的腳步。

綜合而言，在此反「和平演變」階段之外交政策分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六四事件」發生後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前，著重於維護國家安全的近程目標，之後則著重於加速於經濟建設的中程目標。(2)外交政策取向：由前段的「孤立」轉變為後段的「不結盟」。(3)具體行動：聯合第三世界國家共同反「和平演變」，並擴大南北矛盾為「和平演變」減壓。(4)外交行爲：前段著重於第三世界，後段恢復全方位外交。

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在此時期之初，經濟力因政治動蕩而有衰退，但隨著政治逐漸穩定而又很快恢復為上升趨勢，故其由「鎖國」轉為「芬蘭化」取向。(2)外向性：仍持續處於「操控」取向，藉由第三世界以平衡「和平演變」的威脅。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因「六四事件」後中共欲對抗外來威脅，而開始大幅增加國防經費。故此階段戰略雖是由「強(內)強(外)型消極守勢戰略」向「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戰略」發展，但因中共有意加速國防力提升，進而造成國際社會產生「中國威脅論」的疑慮。

八、大國外交(1996 以後)

¹²⁰ 馮志，〈從「十四大」看中共對外關係〉，《中共研究》，26卷11期(1992年11月)，頁55。

¹²¹ 《海峽評論》，1992年1月，頁7。轉引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1982-1992)〉(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205。

¹²²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02。

一般而言，自 1996 年以後，中共外交關係便邁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也就是推動「大國外交」，與世界大國陸續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這是中共過去所不敢想像的。¹²³其主因乃在於 1992 年美國總統柯林頓上台後，對中共採取新一波「交往與擴大」戰略，以及中共有感於在 1996 年台海飛彈危機的軍事實力不足應付美國外力干涉，故暫時退而求其次，重心轉向致力於與西方大國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希冀藉以突破美國「和平演變」威脅及對中共崛起的壓制。

換言之，中共外交政策由具有「衝突性」的現實主義—反「和平演變」調整為具有「協調性」的現實主義—「大國外交」，有化被動為主動之意涵。其中，有關「大國外交」特點有四點：¹²⁴ (1)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發展友好，互不對抗，不針對，不損害第三國；(2)著眼大局，面向未來，不因分歧和矛盾影響國家關係的健康發展；(3)推動以經濟貿易科技交流為重點的各個領域的合作；(4)建立元首互訪、總理會晤、高級官員磋商、熱線聯繫或其他的溝通協調機制。

由於中共綜合國力的崛起，加上經濟上改革開放並降低意識形態的干擾，強化了後冷戰時期對體系大國定位下的「大國外交」思路。其中，體系大國以保衛和發展經濟、科技和軍事能力為核心目標，特別注重與體系裏其他主要行動者的關係，而主要的當然是與其他大國關係，其實際的互動過程可能是妥協或衝突。由此可看出，中共在與西方大國交往態度上，標榜全面性外交，強調既競爭又合作的互動模式，求同存異，以平等主義、國際和平、反對霸權的形象，配合國家發展所需要資源，全面開放與各大國之間的多元合作交流。¹²⁵

事實上，中共所謂的「大國外交」即為建立大國之間的夥伴關係。而所謂的「夥伴關係」，主要指涉的是兩國外交關係的接近與善意，著眼於外交政策上的共同合作，而非所謂建立某種緊密具目的性的軍事結盟關係。中共認為此模式並非國際政治中霸權心態的強權政治，而是發展中大國的務實外交策略。此乃有鑑於自身與其他全球強國國力地位的懸殊，北京領導人認識到當下的大國關係雖有動蕩，但穩定、和平與發展仍是主流。因此，一方面延續傳統，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原則，另一方面藉由強調多邊、開放、參與、與多強外交平衡發展，追求軍事、經濟等自身綜合國力提升與壯大。¹²⁶換言之，中共的「大國外交」即為借重多邊與其他全球強國交往，以使強國之間彼此相互制衡，進而從中獲得利益。

¹²³ 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199。

¹²⁴ 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199。

¹²⁵ 〈構築新世紀的新型國家關係〉，《人民日報》，1997年12月8日，<http://218.17.222.243/was40/detail?record=122&channelid=7184>

¹²⁶ 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200。

另外，中共在 1997 年「十五大」提出一套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外交主要方針之「十要說」(如表 2-3)。其中，中共學者認為中共應繼續秉持務實原則，強調希望超越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分歧，在「和平共處五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發展全方位外交關係。這不僅可使其持續加強與亞太周邊國家等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也可以拓展與其他第三世界及第一、二世界國家的友誼。

表 1-3：後冷戰時期中共的外交方針

原則	內容
1. 獨立自主	要堅持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始終不渝的奉行「獨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
2. 不結盟、反霸	對於一切國際事務，要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與政策，不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不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不進行軍事擴張。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強加於人，也決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型態強加於中國。
3. 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要致力於推動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4. 相互尊重	要尊重世界的多樣性，各國有權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社會制度、發展戰略和生活方式。
5. 睦鄰友好	要堅持睦鄰友好，這是中國的一貫主張，絕不改變。
6. 加強與第三世界合作	要進一步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團結與合作。
7. 和平共處	要在「和平共處五原則」上，繼續改善和發展與發達國家之關係。國與國之間應超越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異，相互尊重，友好相處。
8. 平等互利	要堅持「平等互利原則」，與世界各國與地區展開廣泛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與科學文化交流。
9. 積極參與國際組織	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
10. 與各國積極交往	要在「獨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原則」的基礎上，與一切願與中國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與合作關係，促進國家關係發展。

資料來源：張亞中、李英明，《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概論》(臺北：生智文化出版，2000 年)，頁166。

進而言之，筆者比較分析表2-2、2-3，得知中共自1982年實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以來，已逐漸脫離建國之初的搖擺不定的傾「左」或靠「右」外交政策狀態，顯示其已不再以國際社會「受迫害者」自居，而強調反霸、反軍備競賽、不結盟與代表第三世界大國自居。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共更自我定位為

一個「發展者」，並致力提升大國地位形像及擴大影響力，進而以積極的「參與者」角色投入國際社會，開始推動建立國際多極體系的長程目標。

然而，自 1990 年代以來，國際社會討論中共問題常將「中國崛起」(Rise of China)與「中國威脅」的概念相提並論。¹²⁷這是由於一方面，中共在「六四事件」後，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隨著全球化時代到來，經濟實力迅速向上發展。其主要表現如以下幾點：¹²⁸ (1)在 1990 年前後中共產業完成了再工業化的轉變；(2)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三產類比重超過第一產業；(3)國民經濟進入持續高速增長的新階段；(4)對外貿易迅速發展；(5)外資流入一直保持世界領先水平。另一方面，國際局勢進入後冷戰時期，形成「一超多強」的格局，中共因國力快速增長，影響力日漸擴大，被美國視為最具潛力挑戰其霸權的對手。

2003年12月中共總理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強調「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的大國」，¹²⁹這是中共高層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共未來形象，並作為自身角色定位。顯示中共有意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作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¹³⁰不過，2004年4月24日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博鰲亞洲論壇中強調中共將堅持「和平發展」的道路談話，以及2004年4月26日中共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在上海的談話，闡述中共為一社會主義國家，在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條件下，決心走一條在維護世界和平中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促進世界和平的發展之路。¹³¹似乎有意以「中國和平發展」的論述來取代對「中國和平崛起」的強調，以防外界對中國黷武、稱霸意圖的防衛及圍堵。

但無論是「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中共所強調的國際形勢與戰略內涵都是一樣的，即中共以和平發展，新安全觀與共同利益的強調，布局多極化世界體系的「大國外交」關係。從求同存異的多贏觀點，尋找並建構合作大於對抗的非零合基礎，極力讓世界各國認知中共的崛起將是和平崛起，而非挑戰和威脅，並以「中國機遇」粉碎「中國威脅論」或「中國崩潰論」的負面預言，建立和平環境，在參與國際化的同時，仍提防西方勢力「和平演變」中共之可

¹²⁷ 有關中共是否成為美國的威脅？美國學者看法分歧。現實主義者視之為潛在的威脅，主張藉由嚇阻等手段維持權力平衡；自由主義者認為讓中共接受國際機制的規範可降低與之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系統傾向的建構主義者認為與中共正面的互動會走向和平，但負面的互動有可能走向衝突；國內因素傾向的建構主義者強調藉由經濟發展的方式可將中共轉化為與西方相近的資本主義式民主國家。轉引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197。

¹²⁸ 夏立平、江西元，《中國和平崛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44。

¹²⁹ 多維新聞網，〈溫家寶哈佛大學演講：「把目光投向中國」(全文)〉，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Opinion/2003_12_11_18_25_19_863.html

¹³⁰ 賴昱安，〈大國外交與睦鄰戰略〉，收錄《胡溫體制的平衡戰略—思維與政策》，朱新民主編(臺北：遠景基金會，2005年)，頁198。

¹³¹ 黃仁偉、張來春，〈試論中國和平戰略中的新觀念〉，《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6期(2004年)，頁59。

能，主張走「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換言之，中共乃是以「大國外交」為手段，實現「和平崛起」或「和平發展」戰略目的，進而建立「多極化」的世界新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正式文件中雖然有「大國」的自我稱謂，但並沒有「大國外交」一詞。學界直接援用「大國外交」的例子有限，但關於「大國戰略」、「大國關係」的文章很多。基本上，有關中共「大國外交」的專論約出現於 1998 年以後，到 2000 年底達到高峰。這大概與當時中共領導層與西方大國元首密集互訪，並接連主辦數項大型國際高峰會議有關。¹³²

綜合言之，在此「大國外交」階段，有關外交政策析如下：(1)外交政策目標：處於持續「改善本國經濟」、「增加本國威望」的中程目標朝向建立新國際秩序的長程目標前進。(2)外交政策取向：由「不結盟」朝向「外交聯盟」前進。(3)具體行動：與世界各大國建立更加緊密的政治與經濟互動關係。(4)外交行為：實行全方位外交，與第一、二、三世界的大國及國家集團成為夥伴關係。

另外，有關安全政策分析如下：(1)內向性：持續「芬蘭化」取向。(2)外向性：仍持續以「操控」取向為主，以求權力平衡。綜合而言，中共在此時期經濟力仍處於向上提升，而國防力亦於 1996 年台海危機後，積極從事軍事現代化建設，雖然尚不足與美國對抗，但此階段戰略已有意朝向「霸權」來發展，故此階段中共戰略類型由「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戰略」朝向「弱(內)弱(外)型積極攻勢戰略」轉變。

綜合上述，可知中共戰略由建政至今皆採行守勢戰略，不過各階段國家資源運用能力有所不同，故筆者綜合整理中共外交政策取向及戰略分析，如下表 2-4。

表 1-4：中共外交、安全政策取向及戰略類型分析表

外交階段	期間	外交政策取向	行動重心	對於美蘇關係	外交政策目標	安全政策取向	戰略類型
一邊倒	1949-1953	外交聯盟→軍事同盟	蘇聯共產集團	親蘇反美	國家安全、國家統一	內：屈服 外：鑽營	弱(內)弱(外)型消極守勢
和平共處	1953-1959	外交聯盟→外交結盟	第三世界(亞、非洲)	反美，與蘇分歧	國家安全、國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內：屈服 外：操控	弱(內)強(外)型消極守勢
中	1959-	外交結盟	第三世	反美(主	國家安全、國	內：鎖國	強(內)強(外)

¹³² 張登及，〈中國大國外交的類型學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8 期(2004 年 8 月)，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3918

間地帶	1966		界(亞、非、拉洲)	要)、反蘇(次要)	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外：操控	型消極守勢
文革造反	1966-1970	自我孤立	停頓與排外	反美反蘇	世界革命、缺乏目標	內：鎖國 外：鑽營	強(內)弱(外)型消極守勢
三個世界	1970-1982	外交結盟→外交聯盟	第三世界→第一、二世界	反蘇親美	國家安全、國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內：鎖國→芬蘭化 外：操控	強(內)強(外)型消極守勢→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
獨立自主	1982-1989	不結盟	第一、二、三世界	美蘇彈性等距	國家安全、發展國內經濟、國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內：芬蘭化 外：操控	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
反和平演變	1989-1996	孤立→不結盟	第三世界→第一、二世界	美蘇彈性等距	國家安全、發展國內經濟、國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內：鎖國→芬蘭化 外：操控	強(內)強(外)型消極守勢→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
大國外交	1996-2005	不結盟→外交結盟	第一、二、三世界大國	美蘇彈性等距	國家安全、發展國內經濟、國家統一、提高國際影響力、反霸主義	內：芬蘭化 外：操控→霸權	弱(內)強(外)型積極守勢→弱(內)弱(外)型積極攻勢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綜合整理

小結

由於中共自建政以來，深知新中國國際地位平等是靠革命成功而取得的，故「革命外交」成爲在相當時間內中共外交工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其表現在具體的政策中，就是始終有一個「反對」目標，如 1950 年代反對美帝主義、1960 年代反帝反修、1970 年代反霸(蘇聯)主義、1980 年代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¹³³其中，從 1970 年代後期至今，中共外交亦有另一個主題，即爲支持由廣大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由表 2-4 明顯可知，1979 年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後，中共努力爭取加入西方市場經濟規則主導的國際新秩序，進而在國家資源運用上則開始由消極性轉爲積極性，到了 2001 年中共加入世貿組織更成爲融入這個經濟秩序的標誌。¹³⁴換言之，此即意味著在改革開放以前，

¹³³ 張清敏，〈中國的國家特性、國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學報》，第 2 期(2004 年)，頁 52。

¹³⁴ 張清敏，〈中國的國家特性、國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學報》，第 2 期(2004 年)，

中共戰略類型為「消極守勢戰略」。在改革開放以後，其戰略類型為「積極守勢戰略」。難怪鄧小平將改革開放視為中共的「第二次革命」，¹³⁵甚至有學者將其視為中共第二次開國。¹³⁶

另外，自 1982 年以來的中共外交政策取向，吾人亦可將其分為「持續」、「轉變」等二種「演變模型」。換言之，中共在「十二大」以來展現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雖偏離了過去「革命外交」路線，但其基本理念中仍保有「和平共處五原則」、「反霸主義」、「三個世界論」、「統一戰線」等策略，這正是中共外交政策中一貫具有的「持續」原則。

再者，中共自「十二大」以來實施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基本上不外以三個內容：¹³⁷(1)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2)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的友好關係；(3)努力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作用。故歸納其特徵則可為以下幾項：¹³⁸(1)從世界戰略觀點而言，它是一種「平衡外交」；(2)從「四個現代化」觀點而言，它是「經濟外交」；(3)從適用範圍與政策運作層面的觀點而言，它是「全方位外交」；(4)從手段的觀點而言，它是「和平外交」。如果將這些特徵與過去中共所執行的「一邊倒外交」、「政治掛帥」、「地域性外交」、「革命外交」等對照起來，更明顯看得出中共「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取向的轉折性變化。

如今，中共外交政策仍繼續以實行「獨立自主」為主軸，並隨著國際環境而有所調整，從「韜光養晦」轉變成「有所作為」的「大國外交」戰略，進而在亞太地區和全球事務發揮相當程度的影響力。因此，筆者認為後冷戰時期大國之間建構一個新的國際戰略穩定框架已是大勢所趨，這種戰略穩定框架將是中共與世界上其他大國進行戰略合作的基礎。無怪乎中共於「十六大」報告在闡述外交工作時，第一次將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而不是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放在中共對外關係的首位。¹³⁹進而言之，在與西方發達國家美、日、歐盟關係中，又以歐盟對中共在安全上較不具威脅性及經貿上具互補性，使得在後冷戰時期中(共)歐雙邊關係發展快速，並有意朝向發展全面性戰略夥伴關係。為此，筆者將繼續針對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歐盟戰略進一步深入研究，期能驗證中共戰略之實然與應然之一致性。

頁 52。

¹³⁵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 113。

¹³⁶ 宋國誠，〈全球化與中國：機遇、挑戰與調整〉，收錄《21世紀中國—全球化與中國之發展》，宋國誠主編(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2年)，頁 3。

¹³⁷ 鄭為之，〈我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國際問題研究》，4期(1984年4月)，頁 4-7。

¹³⁸ 姜孝伯，〈中共外交政策取向演變與其變數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11月)，頁 189。

¹³⁹ 張清敏，〈中國的國家特性、國家角色和外交政策思考〉，《太平洋學報》，第 2 期(2004年)，頁 52。